

征稿启事

为了进一步明确科研导向，营造科研氛围，加强院际交流，推广成功经验，推动学科融合，加大科研宣传，科研处将定期或不定期推出《科研简报》，积极宣传我校优秀科研成果、重大科研项目、优秀研究团队、重大智库成果、重要学术活动等，欢迎各学院踊跃投稿。同时，欢迎各学院及时总结在科研组织、有组织科研等方面的优秀经验和做法，积极向《科研简报》投稿，优秀稿件将推荐到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被采纳成果将集中刊发在《北京教育信息（专刊）》。

投稿邮箱：kyc@cufe.edu.cn





中央财经大学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专刊

科研简报

KE YAN JIAN BAO

2023年第1期



主办单位：

中央财经大学科研处

封面刊名题字：

张冰

导 语

系统强化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理化研究阐释，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政治任务和学术使命，有助于推进政治话语学理化、学术话语大众化、中国话语国际化，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学校党委高度重视研究阐释工作，根据学校的统一部署和战略安排，学校科研处今年会把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重要任务，纳入各项工作计划，积极开展研究阐释引导和强化工程，从组织引导、能力提升、成果产出等方面推动研究阐释工作，深化原创性、系统性、学理化、学科化研究阐释，推出一批站得高、看得远、用得上的重要成果。

为了有利于广大师生学习提升研究阐释能力，本期科研简报汇集了近年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经济日报》刊发的我校师生撰写的文章。自 2019 年以来，校领导带头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经济日报》发表文章 46 篇，其中在《人民日报》刊发 13 篇，《光明日报》刊发 24 篇，《经济日报》刊发 9 篇。

因检索不尽完全等因素，本期收录或有不全，敬请谅解！也欢迎各位老师积极向本简报投稿。

目 录

人民日报

必须坚持以发展为首要务·····林光彬	2019-01-29	(1)
问题链教学法让思政课活起来·····何秀超	2019-05-24	(3)
在守正创新中焕发强大生机活力·····冯秀军	2019-06-06	(6)
发挥优势 紧扣特色 瞄准高端 提升高校智库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何秀超	2019-09-23	(8)
切实办好网上思政课·····何秀超	2020-03-12	(10)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何秀超	2020-06-29	(13)
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 以法治手段优化营商环境·····尹 飞	2020-10-30	(15)
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周世愚 周明生	2020-12-29	(17)
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何秀超	2021-03-25	(19)
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何秀超	2022-03-23	(21)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增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和 ·····方 舒	2022-03-25	(23)
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何秀超	2022-10-25	(25)
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李 涛	2023-02-02	(27)

光明日报

发展数字经济,培育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胡树祥 韩建旭	2019-01-30	(29)
谁来盯着好政策落到学生身上·····何秀超	2019-04-16	(32)
营造公平有序的汽车消费环境·····刘 权	2019-04-20	(35)
发挥制度优势 坚定必胜信心·····黄 刚	2020-02-06	(37)
民法典:为信息时代立法·····尹 飞	2020-06-20	(40)
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高 伟 许 雁	2020-10-20	(43)
不朽的丰碑 砥砺前行的精神力量——深刻理解抗震救灾精神的科学内涵 ·····冯秀军	2020-12-09	(46)
明末至民国年间应对疫病的财政措施及其演变·····马金华	2021-07-05	(50)
上好党史大课 培育青年先锋·····冯秀军	2021-07-09	(54)

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林光彬	2021-07-20	(57)
如何理解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	王立勇	2021-08-10	(61)
做好促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财政文章”·····	马海涛	2021-10-12	(64)
把握数字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	孙宝文 欧阳日辉 李 涛	2021-12-14	(67)
让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在伟大复兴征程上熠熠生辉·····	哈战荣 牛子谦	2022-01-11	(71)
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	林光彬	2022-05-10	(74)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做好新时代育人工作·····	何秀超	2022-05-13	(77)
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的特征及其理论内涵·····	马海涛 姚东旻	2022-06-07	(80)
见多识深，把大思政课讲深讲透讲活·····	冯秀军	2022-06-21	(83)
有效缓解预期转弱压力·····	王立勇	2022-07-05	(86)
加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推动全球数字治理变革·····	李 涛 徐 翔	2022-09-06	(89)
扎实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何秀超	2022-12-08	(93)
健全现代预算制度 持续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马海涛 肖 鹏	2023-01-17	(96)
数字经济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	李 涛 欧阳日辉	2023-02-22	(99)
提高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王立勇 李瑞琴	2023-03-17	(103)

经济日报

以财政政策为抓手支持乡村振兴·····	马海涛	2021-08-30	(106)
开辟经济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王金照 陈斌开	2022-07-28	(109)
减税降费的重大成效和重要意义·····	马海涛	2022-11-17	(113)
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带来启发与机遇·····	福佩吉 张忠胜	2022-12-22	(118)
如何从供需两侧发力扩大内需·····	戴宏伟	2022-12-28	(121)
构建中国特色估值体系·····	陈运森	2023-03-09	(123)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何秀超	2023-03-20	(125)
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樊 勇	2023-04-04	(127)
夯实数字经济安全发展基石·····	欧阳日辉	2023-04-04	(129)

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

林光彬

《人民日报》（2019 年 01 月 29 日 05 版）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释放的发展能力，是中国制度优势的最好诠释

“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发展的重要作用。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最终靠的是发展；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不断释放的发展能力，则是中国制度优势的最好诠释。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创造了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发展故事。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了持续 40 年的高速增长，GDP 年均增速达到 9.5%，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人口大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 1.8% 上升到 15.2%；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 7.4 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 94.4 个百分点。这些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说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

经过 40 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还形成了全新的发展方法论。发展是社会经济矛盾展开与克服的循环过程，因此发展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既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也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40 年前，我国的主要经济矛盾是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因此发展生产、提高增速就成为当时解决主要经济矛盾的首要选择。40 年后，发展起来后的问题和矛盾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需求侧看，消费升级是大势所趋，人们的需求实现了从有到优的转变；从供给侧看，粗放式的发展难以为继，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在眉睫。正因此，在新时代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仅要毫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更要贯彻发展应该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想。

积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应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满足人们的消费升级也好，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也好，其中的关键都是要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统筹政府与企业两大资源配置主体、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教育与科技两大发展支撑、供给和需求两种力量，用政策协同、体制机制创新充分调

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就能形成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强大合力，持续增强综合国力。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新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也是在新时代更好推动发展的指挥棒。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实现由大到强的关键。让创新释放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让协调成为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让绿色体现在永续发展的每个环节，让开放成为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让共享给予更多人梦想成真、人生出彩的机会，就能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 40 年新起点上瞻望未来，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勇气，有新发展理念的指引，我们一定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发展书写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问题链教学法让思政课活起来

何秀超

《人民日报》（2019年05月24日09版）

办好思政课，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习近平同志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深刻阐述了办好思政课的重大意义，深刻回答了学校思政课建设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进一步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中央财经大学在马克思主义学院组建教学研究团队，探索出问题链教学法，努力让思政课活起来，为各高校进一步办好思政课提供了有益借鉴。

问题链教学法的主要特点

习近平同志强调，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问题链教学法是指在思政课教学中，教师依据教学目标将教学内容设置成以问题为纽带、以知识形成发展和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为主线、以师生合作互动为基本形式的新型教学模式。问题链教学法旨在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通过激发学生思维活力推动思政课教学提质增效。

实施问题链教学法，关键在设置问题，要领在问题成链。一是注重设置贴近学生学习和生活实际的问题。教师要紧密结合不同阶段、不同专业学生的特点，通过问题创设出恰当的情景，依靠问题让思政课吸引学生、打动学生，进而教育学生、引导学生。二是注重问题之间形成逻辑链条。通过设置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通过设置开放性问题培育学生的创新思维，让问题环环相扣、层层深入，注重问题之间形成严密完整的逻辑链条，让学生感受到逻辑的魅力和真理的力量。三是注重教师与学生围绕问题互动。围绕问题，教师悉心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为学生探求真知、增长才干营造良好氛围。

中央财经大学问题链教学法实施以来，较好解决了思政课“要么远离学生、要么迎合学生”的难题，让学生愿意学、有收获，让老师乐于教、有成就。2018年，问题链教学法荣获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问题链教学法的功能作用

习近平同志强调，推动形成全党全社会努力办好思政课、教师认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好氛围。实践证明，问题链教学法让教师有热情教、学生有兴趣学，能够实现思政课教与学良性互动、相得益彰，让广大师生拥有更多获得感和成就感。

提高学生参与度。问题链教学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着眼于增强思政课亲和力，不断提高学生参与度。它一改以往思政课的单向灌输教学模式，初步形成“主体与主体”的互动模式，把教学内容和学生关切紧密结合起来。通过解答问题引导学生穿越理论障碍和思想迷雾，使教学从抽象走向具体、从概念走向事实；让学生由课堂的“旁观者”变为课堂的“主人翁”，感受深邃思想、深刻理论的魅力，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为了提高学生参与度，授课教师提前精选问题，精心设计小组研讨教学环节；学生积极参加分组辩论，思想受到启发，认识得以深化。

增强教学针对性。问题链教学法的关键在设置问题，问题的质量关系到教学的效果。以问题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把教学内容转化为学生思考的问题，转化为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有效回应，让高校思政课回归现实、贴近生活，是提升思政课教学效果、增强思政课教学针对性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设置问题链时，兼顾思政课教材重点难点和学生关注点，找准教材内容和学生思想之间的结合点，在教学结合点上精心设置层层递进的问题链。在设置问题链时，必须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不能为了片面迎合学生的兴趣而偏离教学大纲和教材，而是要牢牢守住底线和原则。

保证教学连贯性。问题链教学法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能保证教学连贯有序。通过对教学主题进行细化、分解而形成的问题体系，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展开，彰显出科学理论的逻辑力量。为此，教学研究团队编写出版了“高校思政课‘问题链’教学详案系列丛书”，教案的设计和编写严格按照明确起点、正确引导、逻辑递进的原则，把那些最终可以导向教材观点和结论的问题作为教学起点，所有问题的选择和设置最终都是为了实现教学目标，确保整个教学形成严密的逻辑闭环。

问题链教学法的实施路径

实施问题链教学法，应遵循提高政治站位、强化问题意识、增强内在逻辑、推进方式创新的路径有效推进，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在创新中提高，切实让思政课活起来。

提高政治站位。高校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不折不扣地落实“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的要求。思政课教师政治要强，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问题链教学法以夯实思想基础为指向，致力于在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坚持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在教学目标设定、课程内容设置、教材选用等各个环节都始终坚持正确政治导向。

强化问题意识。问题链教学法注重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突破过去那种照本宣科、把教材观点作为教学起点的教法，以学生感到困惑的问题、教材观点和结论背后隐藏的问题为起点，沿着解疑释惑的认知路径展开教学，沿着层层递进的问题链深化教学。这样做，既体现了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又彰显了逻辑的力量、理论的魅力，有力提升了教学效果。

增强内在逻辑。问题链教学法在设置问题体系时，围绕授课内容将各个问题串连成一个逻辑链条，形成相互联系、层层深化的“问题簇”，问题与问题间、问题与答案间、问题内部各要素间有着清晰的内在逻辑关系。为确保问题体系和逻辑路径科学合理，中央财经大学围绕教学主题组建项目化教学团队，教师不断加强对教学问题的类型、性质和特点的逻辑分析与研究，提高解答问题的能力。

推进方式创新。高质量教学内容和多样化教学方式相结合，才能让教学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央财经大学着眼于大思政格局，搭建以问题链教学法为核心的“主课堂+”立体教学模式，推动主课堂与拓展课堂无缝对接。在实践课堂方面，以“行走的课堂”为总题，以课堂实践为主体，以暑期实践和专业嵌入实践为两翼，创设“一主两翼”实践教学模式，推动教学向课外延伸拓展。在网络课堂方面，打造“小马乐道”微信公众号、“形教视窗”等网络平台，录制慕课、教辅片、魅力微课系列等。在人文课堂方面，围绕思政课教学目标开设思政选修课、人文通识课。

（作者单位：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在守正创新中焕发强大生机活力

冯秀军

《人民日报》（2019 年 06 月 06 日 13 版）

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风云激荡，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深刻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上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历史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一度甚嚣尘上。然而，历史的发展并未如一些人所料，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奇迹，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当今世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普遍困惑，中国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坚持做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全球和平发展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以能在各种风浪中笃定前行？一言以蔽之：根本在守正，关键在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有生机活力的根本在“守正”。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高度统一。它的科学性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之上，它的革命性建立在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崇高理想之上。科学性决定它无论经历怎样的潮起潮落终将走向胜利；革命性决定它能够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获得磅礴力量。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站在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上，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持续发展的强大定力。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贯穿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创新成果，为中国巨轮行稳致远提供了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富有生机活力的关键在“创新”。理论只有立足时代才能跟上时代，只有扎根实践才能拥有活力之源。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序言中指出的那样，“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主义一旦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就开始了立足时代

特征、扎根中国实际的中国化过程，也开启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过程。我们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推进实践和理论创新。40 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一场创新永远在路上的伟大创举，极大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社会生产力。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那么，创新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立足时代、扎根中国，持续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必将不断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创造出让世界瞩目的新的中国奇迹。

在新时代改革开放征程中，我们将继续坚持守正创新，既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大胆地闯、勇敢地试；既注意社会变革的深刻性、广泛性、复杂性，又保持社会发展的方向性、稳定性、连续性。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在党的领导下坚定“四个自信”，以守正锚定方向、以创新激活动力，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

（作者单位：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发挥优势 紧扣特色 瞄准高端 提升高校智库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何秀超

《人民日报》（2019 年 9 月 23 日 07 版）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高校作为智力和人才的重要聚集地，在智库建设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和深厚积淀。高校智库建设是我国智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服务党和政府决策的重要途径，是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重要载体。高校应充分发挥学科齐全、人才密集和对外交流广泛的独特优势，立足自身特色，努力打造一批党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的新型智库，建成一批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回应国家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期待，更好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决策研究咨询机构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智力支持，为国家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水平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大力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充分发挥智库在国家治理和对外交往中的重要作用，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战略性任务。但从总体上看，我国智库建设还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缺乏整体规划、资源配置不够科学、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亟待创新、领军人物和杰出人才缺乏等，这些问题在高校智库建设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新时代，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高校智库建设置于构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新格局的大背景下来考虑，努力在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方向上下功夫，在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下功夫，在坚持改革创新、体现中国特色上下功夫。为此，必须加强统筹谋划、创新体制机制、激发人才活力，发挥优势、紧扣特色、瞄准高端，多措并举推进高校智库建设。

加强顶层设计，聚焦主攻方向。科研管理体制创新和高端智库建设关系学校科研工作的动力、活力与方向，应作为学校重要的发展战略来研究和推动。要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学校特色、凝练主攻方向，变“撒胡椒面”“广种薄收”为“精准对焦”，集中精力攻难关。加强统筹谋划和制度建设，建立完善科研经费管理等一系列制度办法，从战略规划和行动落实上逐步完善科

研管理工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建立健全以信任为前提的科研管理机制，减轻科研人员负担，充分释放创新活力，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高校科研人员智力服务能力整体提升。

创新工作机制，打造协同创新平台。顶层设计确定后，建立健全科学的工作机制是实现目标的关键。要坚持为广大教师搭建高层次的协作平台，创新科研组织形式，扎实推进人才梯队建设，积极开展科研体制机制创新，自觉推动科研管理工作“放管服”改革，有效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潜力与活力，大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多出高水平成果，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在具体工作模式上，着力打造协同创新平台，加强不同学科以至不同学校间的协同，助推学科融合与交叉研究，实现优势互补；遵循科研规律和科研人才成长规律，搭建涵盖各种科研形式、覆盖各层次学术人才的完备科研支持体系，系统开展科研梯队建设；根据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需要设立资助项目，助力学者开展针对性研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设计科学的科研考核体系，将智库成果纳入科研考核范围。

突出分类管理，落实个性化服务措施。依据各类依托机构定位、功能和作用的不同以及学校发展需要，对智库平台进行分类管理，努力形成定位清晰、管理有序的建设模式，聚焦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需求，开展高层次的应用对策研究和战略咨询；加强对基础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项目的培育和扶持，提高基础理论研究整体水平，为应用型学科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基础理论支撑；不断完善科研财务和管理服务工作机制，为科研人员在预算编制、经费支出和财务决算等方面提供专业化服务，提升科研管理实效。引导科研人员在立项阶段选准课题，侧重选取重大问题、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和苗头性、趋向性问题。推进成果报送渠道的系统性建设，积极与政府有关部门联系沟通，找到决策咨询和智库研究的契合点，以鲜明的问题导向开展有针对性的课题研究，努力以高质量研究成果更好地提供决策参考。

扩大对外交流，拓展中国智库的国际“朋友圈”。充分发挥高校对外交流合作的优势，以更宽广的视野加强高端智库建设，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拓展中国智库的国际“朋友圈”。重点建设一批全球性问题和区域问题研究基地，着眼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立足重要研究领域的前沿，组织力量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努力提出解决全球性问题和我国改革发展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案。深耕密织国际合作网络，大力推进科研“走出去”，打造科研国际化协同研究平台。在提高质量和突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上下更大功夫，建设一批社会科学专题数据库和实验室、软科学研究基地，强化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储备性和基础性研究。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切实办好网上思政课

何秀超

《人民日报》（2020 年 03 月 12 日 09 版）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军全国上下艰苦努力，当前已初步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在这场严峻的斗争中，高校面对青年学生一时难以到校上课的实际，要用心用情办好网上思政课，引导青年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把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

办好网上思政课，要把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将师生亲见亲闻亲为的鲜活事例贯穿于思政课教学，进一步提升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让青年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精准研判、迅速部署，全面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顽强拼搏，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广大医务工作者、人民子弟兵奔赴一线，成为“最美逆行者”。广大群众积极配合相关防控措施，为疫情防控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党中央统一指挥下，29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队等调动大量医疗与生活物资紧急驰援湖北，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在很短时间内建成并交付使用，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武汉市以外地市，等等。疫情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充分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让世界各国人民看到一个负责任大国出色的政治领导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源于事实的理论解析最有说服力。办好网上思政课，要将党中央决策部署、各地区各部门联防联控措施成效、疫情防控中涌现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等作为案例融入思政课教学，讲好中国抗击疫情故事。结合青年学生的思想困惑，循循善诱，把事实和道理讲清楚讲透彻，让青年学生好理解、易接受，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更加坚定众志成城、同舟共济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的信心和决心，不断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让爱国主义精神在青年学生心中牢牢扎根。

促进青年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高校思政课教学带来较大影响。高校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根据教育部对疫情防控期间思政课线上教育教学的统一部署和安排，切实办好网上思政课，促进青年学生身心健康成长。

高校思政课教师应按照“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管理等方面不断改革创新，特别是准确把握青年学生认知规律和接受心理，用心用情加强“五个引导”，启发青年学生深入理性思考、保持身心健康、获得成长力量。一是引导正视疫情。这次疫情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对青年学生而言，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受到较大影响。要教育引导青年学生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二是引导理性发声。网络信息纷繁复杂，要教育引导青年学生依法依规文明上网，善于甄别各类信息，理性思考分析问题，辨明是非，不信谣不传谣，积极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三是引导尊重科学。面对疫情，科学防治至关重要。应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积极宣传普及疫情防控知识，用科学理性的声音引导身边人正确看待疫情、增强防护能力。四是引导尊重生命。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敬畏自然、尊重生命，认识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只有保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人类社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五是引导自觉自律。受疫情影响，当前教育教学以学生居家学习为主。要教育引导青年学生自觉服从学校安排，增强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束，养成良好自学习惯，努力做到延迟返校不误学业、自我提高不误成长。

激励青年学生自觉担当作为

思政课无实践则空，无理论则浅。只有两者协调统一、相互促进，才能提升青年学生的获得感，并激励他们自觉担当作为。

网上思政课教学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瞄准青年学生的思想共鸣点、情感触发点，用科学理论阐释实践，用实践案例增进理性认识，既重“理论教化”，更重“观念内化”，让青年学生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在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顽强拼搏，广大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日夜奋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而动、敢打硬仗，广大群众众志成城、守望相助，广大公安民警、疾控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等坚守岗位、日夜值守，广大新闻工作者不畏艰险、深入一线，广大志愿者真诚奉献、不辞辛劳，展现了中华儿女临危不惧、迎难而上、奋勇拼搏、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为办好网上思政课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素材。在教育系统，科研工作者协同作战，加强科研攻关；青年学生争当志愿者、宣传防疫知识、积极响应居家隔离的号召，用实际行动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担当。要通过网上思政

课教育引导青年学生进一步接触社会、了解国情，充分挖掘青年学生的身边典型和榜样，讲好他们的感人事迹、动人故事，教育引导青年学生强化责任、敢于担当，做到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中。

（作者单位：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何秀超

《人民日报》（2020年06月29日09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大论断和战略任务，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高校要发挥优势、守正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

把握主基调。对于高校而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既是重大理论研究任务、学科建设任务、人才培养任务，更是重大政治任务和战略任务，要把握主基调、打好主动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加强和改进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必须加强和改进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为目标，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根本任务，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重要使命，根据高校发展目标和发展定位，着眼长远布局、积极主动作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各类风险挑战不断增多。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把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放到“两个大局”中去思考、放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去谋划，强化担当作为、回应时代呼声。

扎根主阵地。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必然要求。如果理论研究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没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更无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供智力支持。高校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毫不动摇地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全过程。为我们党治国理政提供思想和智力支持，是我国高校的重要职能，也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肩负的重要使命。这就要求高校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过程中，把工作重心放到研究我们党治国理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来，放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思路和科学方法上来，真正做到为人民做学问、为国家建良言。

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独具特色的思想理论体系，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提供了强大思想支撑，我们要善于从历史中获取开启未来的智慧。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我们要扎根现实沃土、着眼现实问题，主动承担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下好关键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当前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是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具有原创性贡献的科学理论体系，贯穿着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对于高校而言，要充分发挥人才密集、研究力量雄厚的优势，在做好研究阐释工作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通过设立主题出版项目等形式，不断推出学术研究精品和理论创新成果。二是讲好中国故事，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高校必须增强紧迫感、使命感，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为重点，结合学校学科布局特点，积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让世界了解“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三是充分发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有重要的育人功能，要面向全体学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养成科学思维习惯，促进身心和人格健康发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引领和价值引导作用。通过课堂教学和学术研究等渠道，推动思想政治工作落实落地、见功见效，在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的同时，不断提升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的能力和水平。

（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 以法治手段优化营商环境

尹飞

《人民日报》（2020 年 10 月 30 日 09 版）

营商环境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市场活力的释放。当前，应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亟须以更大力度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让企业创新创造的活力充分迸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助推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更强、动力更足，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孕育机遇、提供保障。

全面保护产权增强信心。产权内容完备、能够得到有效保护，是市场主体持续参与竞争、积极创新创造的重要基础。民法典规定，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保护，从而为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产权和自主经营权提供了坚实法律基础。民法典的通过和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让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使包含物权、债权、知识产权、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的财产权益体系更加科学完备、权能更加细化优化。同时，物权请求权、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等权利救济方式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强，产权激励更加有效。市场主体的各类财产权益得到法律更为全面确认和充分保护，创新创造的内在动能更加强劲。

完善市场机制保障公平。公平是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竞争、充分发挥活力、实现优胜劣汰的基本条件。公平意味着各类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保护平等和发展机会平等。近年来，各种市场准入壁垒逐渐破除，通信、能源等重点行业逐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公平统一的市场监管制度已经确立并逐步完善。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在法治建设上强调促进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更加尊重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特别是随着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落实，对企业的不合理限制日益减少，不同所有制市场主体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的格局日益成熟，市场主体创新创造的信心更为坚定。

开放市场体系激发活力。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求各类生产要素都尽可能进入市场、充分流动，最大限度发挥效益。当前，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重点，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正在加快建设。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更加健全，同权同价、流转顺畅、收益共享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已经确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加快形成；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深入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抵押融资在制度上成为可能；土地、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海域使用权、无居民海岛使用权、采矿权流转以及自然保护区内自然资源资产特许经营权等制度日益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不断推进，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落地，面向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逐步加强。为回应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数据、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等写入民法典，数据与个人信息的界限进一步厘清，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水平大大提升，为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拓宽了渠道。各类生产要素更为全面、深入地实现市场化配置，为各种新产业新业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提升服务水平优化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随着政府职能加快转变，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如重审批、轻监管、弱服务等得到明显改观。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持续精简，各类审批、登记、备案时限大大压缩。网上办理、“最多跑一次”等促进了投资和交易便利化，显著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市场主体更加安心经营。事中事后监管得到加强，行政执法更加严格规范，市场监管体制得以理顺，各类市场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切身体会到“放管服”改革带来的便利和实惠。应进一步巩固已有改革成果，将行之有效并可长期坚持的做法逐步上升为制度规范，更好以法治手段维护公平竞争环境，持续释放市场创新活力。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商业法研究会副会长）

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

周世愚 周明生

《人民日报》（2020 年 12 月 29 日 09 版）

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这为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决策部署，有效利用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水平和效能，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

以数字技术赋能公共服务，能够有效提高数据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在数字技术推动下，政府可以跨部门、跨层级进行数据信息识别、分析、预判，以此为基础精准施策，既能提高公共服务支出的公平性和效率，又能有效促进政府各部门的决策沟通和协同互动，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同时，运用数字技术不仅有利于拓展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渠道，也能有效减少因信息不对称降低公共服务效率。实践中，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搭建的远程医疗服务、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等，既能有效扩大高质量公共服务的辐射范围，又能打破地区间、城乡间因经济发展水平和治理资源差异而产生的公共服务获得性壁垒，促进跨区域、跨城乡公共服务的合作与共享。“十三五”时期，我国在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十四五”时期，进一步发挥数字技术在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方面的作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推进数字技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规范使用。加强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加快建立数据共享机制，推动数据信息标准化，明确责任和流程，切实打通“信息孤岛”，将市场反馈信息和公众需求信息等及时纳入政府公共服务决策，大幅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化水平。同时，将数据资源的开发使用纳入法治化轨道，建立数据隐私保护制度和安全审查制度，加强对政务数据、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建立数据资源清单管理机制，完善数据权属界定、开放共享、交易流通等标准和措施，规避数字技

术滥用引发的治理风险，更好发挥数字技术对提高公共服务效能的促进作用。

建立公共服务质量实时监管机制和长效评估机制。一方面，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对公共服务供给情况进行全流程监管，实时获得公共服务的绩效反馈，对公共服务质量进行实时监管，切实保障公共服务供给的品质。另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的存储功能和预测功能，建立公共服务数据库和相应的质量评价体系，加快形成公共服务质量评估流程，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

做好相关人才培养工作。当前，我国数字技术人才较为缺乏，熟悉公共服务的数字技术人才尤其紧缺，做好相关人才培养工作是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智能化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可以通过专业岗位培训、人才引进、人才共享等方式，提高数字技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水平。同时，利用大众技能培训、数字技术普及等方式，提升公众掌握和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实现供需双方有效衔接，促进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

何秀超

《人民日报》（2021 年 03 月 25 日 09 版）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时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推动高校党建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确保党的教育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高校有效贯彻落实，对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教育强国具有重大意义。

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独特优势在教育领域的重要体现，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总结我国高校发展的历史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改革开放后颁布的《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事关高校党的建设的方向性、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了推进我国教育发展的“九个坚持”，其中第一条就是“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推动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什么时候党对高校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就很顺利；什么时候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弱化，高等教育事业就难以实现健康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根本，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动摇。高校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检验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全面领

导的重要标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高校教师不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功能，还承载着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重任。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高校必须统筹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事”，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真正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紧紧抓在手上，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统筹教师、教材、教学各环节，更新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手段，把传授知识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把系统教育与专题教育结合起来，把理论武装与实践育人结合起来。统筹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建设，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体系。

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教育、靠人才。进入新发展阶段，高校必须融入党和国家发展大局，推动学科建设与产业发展、社会需求、科技前沿紧密衔接，全面提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能力，为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提供有力支撑。面向国家和区域发展需要，提升科学研究能力，加强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集中攻关解决“卡脖子”问题。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继续加强高等学校章程建设、健全治理结构、完善制度体系、优化工作流程、加强依法治校，推进高校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充分释放办学活力，提升高校发展效能。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

何秀超

《人民日报》（2022 年 03 月 23 日 09 版）

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带领人民创造更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追求。教育关系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高等教育是党的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职责使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人民至上的理念落实到高等教育的具体工作中，为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而言，“人民”二字重于千钧。回望百年波澜壮阔的党史，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是为了人民根本利益；领导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也是为了人民根本利益；领导人民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为了人民根本利益。人民至上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体现在一代代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把人民至上的理念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在收入分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顺应人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期待，着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

教育是民生之基。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走过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不平凡历程，办学规模、培养质量、服务能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高等教育与祖国共进、与时代同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 1977 年的 2.6% 提高到 2020 年

的 54.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需要日益增长，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了更高期待。坚持人民至上，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必须回答好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不断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评价标准，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期待。

努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学生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重视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手段、不断改善课堂教学状况，在改进中加强、在创新中提高，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各方面、各环节。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根铸魂、启智润心，教育引导學生扬爱国情、立强国志、践报国行，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把自身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时代沃土上挥洒汗水、勤奋耕耘。

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的栋梁之才。把握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研究分析并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以及各地区、各行业、各领域的需求，在服务需求中形成优势、办出特色，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知识学习与科学研究、能力培养有机结合。倾听学生、家庭、社会对教学科研各项工作的意见建议，强化育人的制度保障，为学生的学术研究、社会实践以及创新创业提供更广阔平台和更坚实支撑，努力让学生成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的栋梁之才。

努力引导学生砥砺奋斗之志、增强奋斗精神。教育引导學生充分认识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必然会面临许多艰巨繁重的任务，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无论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还是创造个人的出彩人生，都需要艰苦奋斗。教育引导學生树立高远志向，历练敢于担当、不懈奋斗的精神，以勇于奋斗的精神状态、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做到知行合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为干事创业储备力量，让人生在奋斗中焕发夺目光彩，用实际行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在接续奋斗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 增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

方舒

《人民日报》（2022 年 03 月 25 日 09 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重要职责，担负着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做好风险研判、预警、应对等工作，增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对于夯实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层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基层应急管理全过程各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和支持，中国才能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我们才能成功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应变局，才能打赢这次抗疫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增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基层应急管理全过程各方面，把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基层应急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环节众多，需要运用系统思维，把各方面工作联系起来分析、统筹起来谋划。做好基层应急管理工作，必须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引领作用，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既发挥好应急管理、自然资源、气象、水利、生态环境、交通运输、住房和城乡建设、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的职能优势，又发挥好应急管理议事协调机构的牵头抓总作用，通过建立健全基层应急管理“红色网格”，不断增强基层应急管理的向心力，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基层应急管理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增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必须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促进社会共治，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各类事故隐患和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易发多发，影响公共安全的因素日

益增多。增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必须坚持底线思维，牢固树立风险防控意识，完善公民安全教育体系，推动安全宣传教育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加强公益宣传，普及安全知识，培育安全文化。常态管理是应急管理的基础，增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要坚持预防与应急并重、常态与非常态结合，将应急管理纳入基层治理能力进行统筹考量，管在平常、理在日常。开展常态化应急疏散演练，积极推进安全风险网格化管理，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发挥好应急管理部的综合优势和各相关部门的专业优势，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衔接好“防”和“救”的责任链条，确保无缝对接。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强化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科技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应急管理装备技术支撑，优化整合各类科技资源，推进应急管理科技自主创新，依靠科技提高应急管理的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增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加强基层应急管理“硬件”建设，强化关键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科技支撑，加大先进适用装备的配备力度，准确把握安全风险的规律特点，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全面排查风险，找准重大风险，有效化解风险，全面提高基层突发事件响应和处置能力。当前，以 5G、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做好基层应急管理工作拓展了平台和路径、丰富了手段和办法。增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必须适应科技信息化发展大势，把握互联网规律特点，以信息化推进基层应急管理现代化，推动管理方式变革。例如，可以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与传统手段相结合，加大智能终端在防险救灾中的使用力度，提高多灾种和灾害链综合监测、风险早期识别和预报预警能力，提升监测预警能力、监管执法能力、辅助指挥决策能力、救援实战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创新安全执法方式，推行在线审批、数字化监管和线上安全培训、远程技术服务，分区分类开展安全监管工作，为基层应急管理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

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哲学社会科学人才

何秀超

《人民日报》（2022 年 10 月 25 日 09 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面部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强调“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

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发展水平。在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既要下大气力全方位培养自然科学人才，也要培养造就大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既是我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需要。从国内看，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需要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从国际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今天，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需要有越来越多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拿出更多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研究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各项事业发展的广阔舞台，完全能够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完全能够培养出大师。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这样的自信！”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的重要力量，必须积极担当作为，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在为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为 2050 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人才基础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加强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高校要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高校党委要加强政治领导和工作指导，一手抓繁荣发展、一手抓引导管理，深化管理体制改，形成既能把握正确方向又能激发科研活力的体制机制。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积极为人才松绑，完善人才管理制度，做到人才为本，信任人才、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包容人才。完善人才评价体系，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体系。

扎根中国大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取得好成果。”高校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大力培养能够从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能够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理论、中国思想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融通中外文化、增进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培养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不断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推进守正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高校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培养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始终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在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中培养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注重树立问题导向，无论是面对关系我国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还是面对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都要让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成为守正创新的过程、成为培养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过程。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李涛

《人民日报》（2023 年 02 月 02 日 09 版）

当今时代，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个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制定颁布了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出台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积极探索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的路径，加快发展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取得了重要进展。同时要看到，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当前仍存在一些瓶颈制约。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中共中央、国务院不久前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 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我们要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以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为重点，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制度保障。

建立保障权益、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清晰界定数据产权可以规范数据处理行为，明确数据处理所涉及的各方权利和义务，从而减少矛盾纠纷、平衡各方利益。这就要求建立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使用的制度，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健全数据要素权益保护制度，为数据要素化、市场化提供重要的制度性基础条件。

建立合规高效、场内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推动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可以促进高价值数据的汇聚连接和开放共享，最大限度激活数据要素价值，对于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具有重要意义。要建立合规高效、场内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完善数据全流程合规和监管规则体系，统筹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激励更多主体开展数据流通和交易活动，扩大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规模，营造良好的数据建设、发展与创新环境，促进数据资源高效配置。

建立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保障市场主体按贡献获得合理收益，

才能激发各类主体参与数据要素市场的积极性。进一步激发各类主体的积极性，要顺应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方面，要健全数据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机制；另一方面，要更好发挥政府在数据要素收益分配中的引导调节作用，建立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

建立安全可控、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数据安全事关国家安全。我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积极开展相关立法和标准制定，构筑起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安全、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安全防护网。面向未来，要进一步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把安全贯穿数据治理全过程，守住安全底线，明确监管红线，加强重点领域执法司法，把必须管住的坚决管到位。同时，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的治理模式，强化分行业监管和跨行业协同监管，压实企业数据安全责任。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

发展数字经济 培育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胡树祥 韩建旭

《光明日报》（2019 年 01 月 30 日 06 版）

在致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各国利益更加紧密相连”。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在此过程中，迫切需要网络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创新驱动。因此，必须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契机，做大做强数字经济，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

1. 数字经济大有作为

当今世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促使数字信息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数字经济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世界主要国家逐渐认识到数字经济带来的巨大机会，纷纷把网络信息技术作为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的重点，作为谋求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一些大型跨国企业也在战略层面推进企业的数字化升级。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面对数字经济领域激烈的国际竞争，党的十九大对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作出了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常态要有新动力，数字经济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近年来，由于我国积极布局信息技术，推动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借助国内庞大的市场体量和网民数量，数字经济发展规模迅速扩张，尤其是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领域已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愈益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17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27.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 32.9%，数字经济领域就业人数超过 1.7 亿，占当年总就业人数的 22.1%，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预计到 2020 年，传统行业的数字化改造将为中国带来超过 40 万亿元的总市场规模。

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是数据。随着网络信息技术与人类生产生活的日益交汇融合，全球数据、知识的爆发式增长和海量集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数据信息因而成

为信息社会最重要的原材料。数据具有可复制、可共享的特性，能够无限增长和供给，可以通过市场自由交易并创造社会财富。数据信息流引领着技术流、物质流、资金流和人才流，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动能。在我国经济发展新时代，数据信息是推动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础性战略资源。用好数据资源，积极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是新时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

2. 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数字经济是以信息和知识的数字化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有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为提升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重要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既包括信息技术、数字产业，也包括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因此，发展数字经济，要同时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加快数字产业化，就是要以信息技术催生新产业、培育新动能。信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加速被社会所普及和应用，并向市场化方向迈进，逐渐衍生出大量新产品、新服务，发展成为数字产业。没有信息技术的持续创新和转化，数字产业是不可能获得发展的。实现数字产业化，就是不断促使信息领域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数字技术、数字技术转化为数字产业，推动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内的信息通信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全球信息领域，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整合能力越来越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数字技术研发的最终结果，不应只是技术报告、科研论文、实验室样品，而应是市场产品、技术实力和产业实力。只有将数字信息和知识转化为生产要素，才能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形成数字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把技术优势化作经济和产业优势。

加快产业数字化，就是要以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实现新发展。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够赋予传统产业新的动能。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全链条的升级和改造的过程，就是产业的数字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能够发挥网络信息技术在产业升级、产品开发、服务创新等方面的优势，促使传统产业不断实现数字化转型。信息技术能够引领农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促进产销的精准对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信息技术的驱动下，工业企业通过大数据分析，能够更好地了解用户、洞悉市场，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促使生产、经营、管理更加智能、便捷和高效；信息技术还浸入物质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使网上购物、移动支付、共享单车、远程教育等新的生活方式成为时尚。发挥好信息技术对于工业、农业、服务业的创新引擎作用，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

3. 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着力点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将进入快车道。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必须找准着力点，努力突破互联网核心技术、扩大国内信息消费需求、打造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在创新引领、中高端消费、共享经济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推动我国数字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要突破网络核心技术，掌握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就会在技术标准制定、产业发展等方面受制于人，难以掌握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为此，必须全面加快网络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集中攻关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移动通信、量子通信、核心芯片、操作系统等重大前沿技术，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高速、移动、安全的支撑。我国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基础较好，关键要加强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同时，不断改革完善网络信息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推进产学研用有机结合，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互相促进的良好局面。

要扩大国内的信息消费，拓展数字经济发展的新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和巨大市场应用规模优势”。近年来，我国网络信息设施覆盖面不断扩大，服务质量和速度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互联网在城乡、区域、行业间发展还不平衡，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众的信息消费。因此，必须着眼于扩大国内信息消费市场，加快信息化服务普惠进程，推动网络信息技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深度运用。要大力实施“宽带中国”战略，进一步加强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形成适应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积极设计和生产符合市场预期和网民需求的产品，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网民的信息消费水平。

建设数字丝绸之路，打造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在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是亚太乃至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应该牢牢把握创新发展时代潮流，全面平衡落实《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释放数字经济增长潜能。同时，我们应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增强数字经济可及性，消弭数字鸿沟，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成员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让亚太地区人民搭上数字经济发展快车”。为此，要鼓励和支持我国企业走出去，利用自身优势和丰富经验，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建立信息示范区，更多打造符合国家需要的数字信息产品和配套服务。在技术交流、数据共享、市场贸易、信息消费等方面，搭建更多共建共享共赢的新平台，培育更多利益契合点和经济增长点，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大新动能。

（作者：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谁来盯着好政策落到学生身上

何秀超

《光明日报》（2019 年 04 月 16 日 13 版）

教育督导作为教育管理的重要环节，作为推动教育政策执行和落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推进教育公平是其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教育督导制度不断完善，督导职能持续强化，督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才能在促进教育公平而有质量的发展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落实政府职责，加大财政投入，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根本保障

政府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其在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投入程度和政策支持程度，决定了教育服务的公平性。督导作为教育领域“决策、执行、监督”中专职监督的举措，其最大的作用在于督促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落实职责，确保包括教育公平在内的教育改革发展各项举措落到实处。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法》，在以往强调县级人民政府教育工作履职，关注在县域范围内教育公平保障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省级人民政府统筹职责，促进教育公平在省域、市域内实现，督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全面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上优先安排教育、财政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教育、公共资源配置上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

教育投入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前提，也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础，这些年，国家教育督导坚持“底线思维”和“目标引领”的思路，督促和引导地方各级政府持续加大教育投入，持续改善办学条件。2016 年起，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启动实施 20 条底线要求的专项督导，督促各地落实资金保障，加快工程进度，补齐薄弱地区“短板”。截至目前，各地累计投入资金 3700 多亿元，全国新建、改扩建校舍 2.2 亿平方米，采购价值 997 亿元的设施设备；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启动实施义务教育学校建设项目，2016-2019 年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275 亿元，全国已累计建设校舍 1500 多万平方米，运动场地 1100 多万平方米，惠及 4000 多所义务教育学校。2012 年以来实施的县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督导评估，促使全国 2717 个县（市、区），全国 92.7% 的县级人民政府加大投入，加快改进农村地区、薄弱地区的办学条件，推动了县域内区域、城乡、校级间的教育均衡发展，促进了教育公平。2017 年推出的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

均衡发展国家认定工作，将成为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更高质量、更加公平上提升的重要推手。

均衡配置资源，关注弱势群体，是推进教育公平的有效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但是整体来看，我们国家的教育发展在区域上、群体间、结构上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影响每个人接受教育的机会、在教育过程中享受的资源和从教育获得的结果，是制约教育公平的重要因素。从教育政策的公平价值追求来看，教育政策应当遵循平等、差异和补偿原则，优化资源配置、关注弱势群体是各类教育政策的内在要求，教育督导当以此为抓手，推动各地均衡配置教育资源，补齐教育发展短板。

2017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工作督导评估监测办法》，督促各地统筹“十三五”期间政策、措施和项目，加快对中西部地区教育发展的支持力度，缩小区域间教育发展水平。建立了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专项督导制度，聚焦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问题，督促各级政府落实城乡基本建设、公用经费、师资配置、装备设备标准统一和“两免一补”全覆盖，建立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资源配置机制。

针对农村学生群体，2015年起实施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督导，确保了覆盖全国1596个县（市、区）14万所学校、惠及近3700万学生、涉及1248亿元中央专项资金的政策得到有效实施。每年组织实施的春、秋季开学工作专项督导，将困难学生资助、北方地区学生取暖、震后灾区复学、随迁子女入学、留守儿童关爱等特殊群体的教育权益保障作为重点督促内容。通过持续开展督导评估，引导教育资源向薄弱地区、弱势群体倾斜，最大限度保障教育起点、过程和结果公平，努力实现教育机会面向所有学生开放的要求。

规范办学行为，提升教育质量，是保障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

再好的教育政策，要想落实到学生身上时，都与学校、教师以及学校各项常规管理密切相关，学校办学、教师教学行为等是学生能否享有自由发展、全面发展并从教育中获得公平结果的决定因素。为此，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工作，针对招生、收费、课堂教学、校园环境等学校办学行为的8个方面主要内容进行常态督导，责任督学覆盖全国99%的中小学校。这些具有丰富经验、深谙教育规律的教育工作者，加强对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方向、标准、质量的规范引导，鼓励与时俱进创新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对加强学校常规管理，提升学校管理水平，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了让每名学生能够“持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建立了对各级各类教育质量评估监测机制，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先后启动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等项目，这些监测和评估为改进教育教学、管理、决策提供依据和支撑，紧紧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充分释放学校

办学生机活力，提升教育质量，努力做到一个都不能落伍，所有人都具有向上发展的机会。

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公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促进教育公平是今后一个时期教育督导履行“督政、督学、评估监测”职能的重要目标，从而督促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指导学校规范办学，协调社会资源支持教育并注重公平，努力让孩子们都能享受到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作者：何秀超，系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营造公平有序的汽车消费环境

刘权

《光明日报》（2019 年 04 月 22 日 11 版）

近日，西安奔驰女车主维权事件，牵扯出汽车消费金融服务费问题，引发舆论哗然。其实，金融服务费早已是汽车消费中公开的秘密，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个金融服务费呢？

开宗明义，购车收取金融服务费涉嫌违法。首先，收取金融服务费主体资格可能不合法。据税务部门最新调查，女车主所交的“金融服务费”，实际上是由第三方陕西元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派驻在西安利之星 4S 店的工作人员收取。元胜公司只留 1% 的金额，剩余 2% 打入西安利之星账户。《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第 3 条规定：汽车金融公司名称中应标明“汽车金融”字样。所以第三方陕西元胜公司可能并不具备从事汽车金融服务的资质。其次，西安利之星 4S 店可能涉嫌欺诈，没有事前明确告知和提示要收取金融服务费。《汽车销售管理办法》第 10 条明确规定：经销商应当在经营场所以适当形式明示销售汽车、配件及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和各项服务收费标准，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或收取额外费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有相关规定。西安利之星 4S 店收取金融服务费，涉嫌侵犯消费者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购车收取金融服务费，似乎已成为汽车消费行业“明规则”。收取金融服务费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加经销商收入，弥补相关成本支出。经销商一般都会尽力推荐消费者分期付款购车，因为相比全款购车，经销商获利更高。消费者交完首付后，一般都想马上提车，但获得银行贷款需要一段时间和过程，所以此时需要第三方公司先行垫付尾款，帮助消费者垫资“过桥”，由此就产生一些费用。另外，经销商推出“零利率”或低利率的贴息贷款方案，也会产生一定成本，需要收取相关费用弥补。因此，大行其道的购车金融服务费事实上弥补了经销商的一些成本，并额外增加一定的收入，但这些收入无疑只能源于消费者。购车金融服务费已经成为行业“毒瘤”，形成了汽车消费完整的畸形利益链条。

奔驰女车主维权事件充分暴露了汽车消费维权的艰难。如果购买的不是奔驰汽车，如果不是女车主坐上车盖哭诉，如果不是网络视频曝光，消费者权利可能就难以得到有效维护，购车金融服务费仍然脱离监管、大行其道。尽管西安女车主最终和 4S 店达成换车补偿等和解协议，但只作为个案，而全国还有千千万万购车消费者正遭遇维权困境，或即将遭遇汽车消费巧立名目的乱收费陷阱。

营造公平有序的汽车消费环境，要消除主要靠低价取胜的恶性竞争局面，培育公平有序的汽车消费竞争市场。企业应坚持“消费者优先”和诚信守法经营理念，完善事前告知与提示制度，对汽车消费金融等服务明码标价，杜绝强制交易等违法行为，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此外，还应该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与员工培训，重视消费者合理诉求，积极快捷处理相关投诉纠纷，严格落实主体责任。

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良性运转的市场离不开守护人。监管部门应积极主动获取各种违法线索，加强消费维权志愿者队伍建设，有条件的可设立举报奖励制度，一经查实存在汽车消费违法行为，坚决严厉追究法律责任。当然，一些经销商可能和相关监管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导致违法不究甚至放纵违法行为的现象存在。因此，应从制度上防止“监管俘获”“权力寻租”，杜绝选择性执法，做到执法公正、平等对待，做到防患于未然。

事实上，这一现象也暴露出了制度建设滞后的问题，必须加大处罚力度、完善法律法规。只有违法成本远大于违法收益时，才会减少违法行为的产生。目前一些法律规定所设定的处罚额度相对较低，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一些经销商抱有侥幸心理，被发现时的处罚额度相对于违法行为所获收益非常微不足道，这一治理窘境也是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结果。应提高违法成本、加大处罚力度，使经销商不想、不愿、不敢违法。

（作者：刘权，系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与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院副教授）

发挥制度优势 坚定必胜信心

黄刚

《光明日报》（2020 年 02 月 06 日 06 版）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着亿万人的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党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为疫情防控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为全国各族人民战胜疫情提振了士气，坚定了信心。面对这场抗击疫情的严峻斗争，信心至关重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显著优势，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也为我们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了坚定的必胜信心。

1. 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把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摆在首要位置

无论什么制度，无论选择何种制度模式，都是有原则的、有立场的。为谁服务、代表谁的利益、把什么看得最重，决定着制度的性质，影响着制度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至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鲜明的价值取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坚定的原则立场。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蔓延的情况下，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就是我们需要集中力量去办的“大事”，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至上性决定的。

生命重于泰山，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快速蔓延、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遭遇疫情严重威胁的严峻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农历正月初一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2 月 3 日召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也事关我国对外开放”。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把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摆在首要位置，把确保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当作头等大事，这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根本要求。人命关天，疫情防控就是当前最重要的大事，这是对人民至上的生动诠释。在疫情防控的非常时期、关键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这样的明确要求，是对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高度负责，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抗击疫情斗争中的充分显现。

2. 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 凝聚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根本观点，也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才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在这些奇迹的背后，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力量，我们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 年特大洪灾、2003 年“非典”重大疫情、2008 年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灾难面前，不仅经受住了考验，渡过了难关，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这些奇迹都是由人民创造的，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力，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中国人民同舟共济，勠力同心，迅速凝聚起抗击疫情的强大力量，展现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坚定信心。各地纷纷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拥有 1000 多万人口、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史无前例地宣布“封城”；“最美逆行者”的身影一队接一队、驰援湖北的医疗队一批又一批；10 昼夜奋战建成一座拥有千余个病床床位的医院；全国范围紧急调用防护服和医用手套等防控物资；广大群众主动登记、自我监测、及时隔离、科学防控的自觉性越来越强……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令人震撼的磅礴力量，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称赞说，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不可战胜的中国力量，来自英雄的中国人民，正如毛泽东所讲：“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人民是共和国的根基，人民是创造共和国历史的主体，也是共和国战胜一切灾难风险的最强大力量。当前，各党政军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紧急行动、全力奋战，广大医务人员无私奉献、英勇奋战，广大人民群众众志成城、团结奋战，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打响了疫情防控的总体战，全国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只要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我们就一定能凝聚起磅礴的力量，取得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最终胜利。

3.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抗击疫情的治理效能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制度执行需要将制度的优势转化为治理的效能。如何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一是要充分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作用。邓小平指出，“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战斗的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把真正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事情作为大事、要事来办，才能把人民的磅礴力量凝聚起来、集中起来。二是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将民主和集中有机结合，充分调动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吸收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这样才能把大事办成、办好。

当前，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的效能，就是要发挥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一方面，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好党的领导在疫情防控中的最大优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对疫情防控工作进行研究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党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党中央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推动有关地方全面加强防控一线工作。在疫情防控中，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政治决断，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和工作安排，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充分发挥了集中统一领导的作用。在接下来日趋复杂的抗击疫情的斗争中，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贯彻到疫情防控的各个环节和整个工作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作用和优势。另一方面，要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抗击疫情的合力。当前，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防控工作正有力开展。我们要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尽快找差距、补短板，切实做好各项防控工作，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作者：黄刚，系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民法典：为信息时代立法

尹飞

《光明日报》（2020 年 06 月 20 日 07 版）

【解码民法典】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已成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根本上改变着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民法典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对信息时代的法律应对勾勒了基本框架。这些面向信息时代的创新规范，切实彰显了我国民法典的时代特色。

为数据进入市场铺平道路

数据是信息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实现资源配置，首先需要解决其权益性质和归属问题。民法典明确宣示个人信息、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等属于合法权益，为数据作为财产、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奠定了法律基础。

就网络世界而言，数据是信息的载体，而信息是数据的内容。数据来源于对各类具有利用价值的信息的收集与处理。但是如果数据不能与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个人信息相脱离，对数据的买卖或者授权使用就不能正常进行。国家机密、商业机密的界定主要通过行政或者经济法律界定，民法的任务在于划定数据权利归属与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楚河汉界。

民法典专章规定了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对侵害隐私权的情形以及个人信息的范围进行了列举。其明确了收集、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以及具体规则，以及信息处理者不得泄露或者篡改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的义务；明确了自然人对于其个人信息查询、复制、异议、更正的权利，以及对于处理者违法或者违反约定处理其个人信息的删除权。尤其是其赋予了信息处理者在经过自然人同意的情况下的数据转让权，以及对于经过加工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数据转让权。这就承认了信息处理者对于依法取得的数据的所有权，并明确了对于数据的处分规则，为数据进入市场铺平了道路。

顺应网络时代交易特点

电子合同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合同。信息时代，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从事商品买卖、提供和接受各类服务已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因应这一时代变化，民法典对于电子合同的特殊规则进行了规范：其一，明确将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合同的书面形式。其二，对以数据电文形式进行意思表示的到达生效规则进行了特别规定。其三，在合同成立上，对实践中争议颇多的电子合同成立时间进行了明确。其四，对于电子合同的履行时间，区分合同标的进行了规定。尤其是对于标的物为数据且采用在线传输方式交付的情形，明确规定以标的物进入对方当事人指定的特定系统且能够检索识别的时间为交付时间。

市场是无数交易的总和，合同是交易的法律形式。民法典对电子合同的规定，将电子合同的适用范围突破了电子商务的限制，扩展到了提供新闻信息、音视频节目、出版以及文化产品等内容方面的服务，从而使得通过互联网的交易遍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全方位。尤其是对数据作为合同标的物的规定，明确了数据作为物的法律性质，明晰了其交付及所有权转移规则，从而为信息时代的交易形式和数据这一信息时代最为重要的资产的归属和交易，确定了基本的法律规则。

避免互联网背景下损害放大效应

互联网开辟了信息流通的“高速公路”，“眼球经济”“粉丝经济”等业态的出现，使得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大大加强。随之而来的是侵权行为的样态愈发复杂，尤其是在人格权领域，通过互联网的传播侵害他人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泄露他人个人信息等更为轻易；而且人格权损害一旦发生，很容易随着互联网上信息的高度流通而快速放大，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有力呼应了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于精神利益、人格尊严、人格自由愈发强烈的保护需求。基于人格权绝对权的性质，民法典系统规定了人格权的保护体系，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从传统的侵权责任中剥离出来，赋予了其基于绝对权请求权的性质。也就是说，对于此类责任的适用，不需要考虑实际损害的发生、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尤其是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时，民法典明确规定权利人可以直接申请法院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加害行为措施，而且只要证明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即可，不需要证明加害人主观上的过错。这对于预防损害的发生以及避免损害结果的扩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信息流动与权利保护有机平衡

当前，网络服务提供者或者说平台日渐成为交易的组织者以及交易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平台经济成为互联网经济的基本表现方式。

民法典重塑了平台责任：被侵权人发现侵害行为后对平台的通知应当包括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错误通知造成他人或者平台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平台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行为人，并根据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而行为人接到转送的通知后，可以向平台提交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及其初步证据。平台则应将该声明转送发出通知者，并告知其可以投诉或者起诉。权利人未及时将已经投诉或者提起诉讼告知平台的，平台应当及时终止所采取的措施。同时强调，平台明知或者应知他人利用其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这一系列“通知—必要措施—声明—公力救济—（若无）停止必要措施”的举措，明确了侵权纠纷发生时受害人、加害人以及平台各方的权利义务，强化了受害人和平台的举证及审查责任，实现了人格权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有机平衡。

（作者：尹飞，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中国商业法研究会副会长）

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

高伟 许雁

《光明日报》（2020 年 10 月 20 日 11 版）

在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国内大循环，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从国内大循环来看，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不断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从国际大循环来看，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助于在提升本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上，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日益明显

国内大循环是指国内的供给和需求形成的经济循环，由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都发生在国内，促进国内大循环就是进一步促进国内各要素与资源的有效流通，以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国际大循环是指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使本国经济成为国际分工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处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状态，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都在不断发展，差别主要在于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还是以国际大循环为主。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于当时的国内外市场状况及国内的资源禀赋情况，确立了“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使我国克服了资本短缺的困境，促进了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拉动了国内经济增长。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开始从“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 2007 年的 9.9% 降至现在的不到 1%，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 7 个年份超过 100%，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不断释放。过去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投资的边际效应不断下降，消费在 GDP 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通过促进国内市场繁荣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进而带动全球经济复苏。当前，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更加

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在需求方面，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人口基数大，消费规模持续扩张，已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通过促进收入增长、改善收入分配来实现消费升级的空间还很大。在供给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发展成为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产业链完整，产业配套能力强，传统制造业的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仍未完全消退，在长期竞争与发展中已成为全球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前提和保障

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中，生产环节依然具有先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是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核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一方面能够为国内大循环的畅通提供动力，另一方面通过带动产业升级，增强产业竞争力，提升我国产业链满足外需的能力，也能够为更高水平参与国际大循环打下坚实基础。最终，内循环的畅通能够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外循环则为内循环提供外部动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推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相互融合、共同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总供给端的调整，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更好地、更及时地适应总需求端，最终实现经济的良性增长。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这些论述指明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

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促进供需平衡，实现供给端与需求端的有效匹配。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一方面受世界经济低迷的影响，外需市场遭遇巨大挑战，另一方面供给领域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生产成本上升，要素价格上涨，生态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下降，导致产业升级缓慢，过剩产能累积，大量需求外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提出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重大战略思想，持续推动要素自主有序流动，不断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得到持续释放。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虽然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但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势在必行。比如，随着“三去一降一补”各项措施得到落实，产能过剩问题得到有效抑制，助推企业脱离低端价值链环节，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大科技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崛起，“卡脖子”核心技术领域有所突破，推动传统产业实现技术进步，提升了国内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当前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还需要

我们继续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之间的对接，构建更高质量的供给体系，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这表明，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作者：高伟、许雁，分别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资产证券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不朽的丰碑 砥砺前行精神力量 ——深刻理解抗震救灾精神的科学内涵

冯秀军

《光明日报》（2020 年 12 月 09 日 06 版）

同自然灾害抗争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次高、造成的损失重。2008 年 5 月 12 日发生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在抗震救灾中，中国人民以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团结一致的强大力量、可歌可泣的伟大壮举，铸就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

1.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是中华民族和衷共济、团结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人民，“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同甘共苦、生死与共，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伟大团结精神的生动写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从改造自然的实践斗争中深刻认识到，在自然面前，尤其是特大自然灾害面前，多么强大的个体力量都显得微弱渺小。只有每个个体团结起来，才能汇聚和激发起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磅礴伟力。因此，“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伟大团结精神，既是一种宝贵的民族品格，也是一种战天斗地的生存智慧，更是一种凝心聚力的强大力量。它支撑中华民族走过几千年风雨磨难，激励中国人民携手战胜巨大灾难、共建美好家园。在汶川特大地震灾害中，从城市到乡村、从部队到厂矿、从机关到基层、从街道到学校，举国上下患难与共，前方后方同心协力，海内外和衷共济……团结勇敢的中国人民在灾难的废墟之上，用感天动地的人间大爱，凝聚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钢铁力量，谱写了一曲“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团结之歌。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是集体主义价值原则的充分展现。灾难是人心人性的“透视镜”，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所遵循价值原则的“试金石”。团结就是力量。灾难来临的生死关头，自私还是互助，逃跑还是逆行，冷漠还是热血，这一道道选择题的答案，归根结底，取决于个体

与集体利益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价值排序。中国人民在抗震救灾中涌现的无数感人事例，向世界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蕴含的集体主义价值原则。将生的希望留给学生的老师，为抢救遇险同胞而敢于牺牲的将士，亲人遇难仍强忍悲痛、坚守救灾一线的党员干部，为灾区捐款捐物、倾力奉献的各界人士……正是有国才有家的群体意识，集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价值共识，让中国人民将“万众”凝成“一心”，用“众志”铸就“钢铁长城”。

“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有力彰显。灾难是一场大考，不同的国家会交出截然不同的答卷，是一盘散沙还是全国一盘棋，是孤军奋战还是八方来援，不同国家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的差别，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在最短时间内迅速动员、组织和汇聚各方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面对特大灾难，在抗震救灾斗争中，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中国人民能够团结起来、共抗震灾的关键因素。震灾发生后，党和国家统筹各方，运筹帷幄；人民军队坚决听党指挥，冒死空降灾区；医护人员一声令下、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新闻工作者挺进第一现场，党员干部冲在灾情最重第一线，志愿者天南地北奔赴灾区，社会各界争先恐后捐款捐物、无偿献血；交通、气象、供水、供电、供气等后方各战线坚守岗位、并肩作战……这些紧张有序、步调一致的行动背后，有着强大的国家制度支撑。从调集人员到支援物资，从收治伤员到安置移民，从建造临时和过渡住所到19个省市对口支援灾后重建，无一不体现了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2. 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民族品格

在同特大地震灾害的斗争中，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畏艰险、百折不挠，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敢于胜利的民族品格。

不畏艰险、百折不挠是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精神基因的体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布满荆棘苦难，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正是支撑我们历经苦难、创造辉煌的不竭力量。《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强奋斗精神经过漫长历史的反复检验和深厚积淀，成为渗透在中华民族血脉之中的文化基因和精神传统。当困难和挑战来临时，中国人民选择“不怨天，不尤人”，坚信“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多难兴邦”，更是中国人民辩证看待、勇敢对待苦难的生动写照。正是凭着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传承，中国人民面对忧患和灾难不悲观、不气馁，用“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自古男儿当自强”来自励自勉，从而成就了无数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人间奇迹。

不畏艰险、百折不挠是中国人民战胜磨难、创造奇迹的强大精神武器。汶川地震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毁坏和伤害超乎想象，灾难以极其惨烈的方式挑战着人们的体力极限、精神极限和生存极限。在地震的废墟前，中国人民以超人的顽强意志，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生命奇迹。一名被压在废墟里的女孩子在手脚受伤的情况下，一遍遍地哼着乐曲，靠着顽强的“钢琴梦想”激励自己不要入睡，最终战胜了死神。在地震中，吃蚯蚓、嚼青草、喝雨水……无数

平凡的中国人用他们的坚强和勇敢，谱写了一曲生生不息的伟大生命赞歌。

不畏艰险、百折不挠是中国人民勇敢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精神支柱。一个伟大的民族之所以伟大，在于她拥有一种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的强大精神支柱和伟大民族精神。强震袭来，地动山摇、天崩地裂，天府乐土顿成废墟焦土。同胞罹难，家庭破碎；房屋倒塌，家园被毁；生态毁坏，生产受损；崩塌、滑坡不断，泥石流、堰塞湖危若累卵。面对满目疮痍的山河家园，中国人民用大爱托起生的希望，用大勇鼓起重建家园的信心。泰山压顶不弯腰，生死较量不战栗，千难万险不放弃，哪里灾情危急就向哪里冲锋，哪里有生死考验就向哪里挺进，哪里有受灾群众就向哪里集结，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中国人民用铁一般的肩膀、钢一般的意志筑起战胜灾难、战胜死神的钢铁长城。救灾难，灾后重建同样难。汶川地震灾区，大多处于交通不便的山区，灾后重建困难重重。但是，在重建家园的战场上，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强大精神力量，再次让中国人民创造了奇迹。短短几年时间，曾经山河破碎的悲伤之地浴火重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3. 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时代精神

同特大地震灾害的艰苦搏斗，既需要自觉发扬人文精神的主体力量，也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在抗震救灾斗争的实践中，中国人民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科学，关爱生命的人文精神与崇尚理性的科学精神交相辉映，极大增强了取得抗击灾难的信心和底气，也为抗震救灾精神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

以人为本，就是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人文精神汇聚全民族的力量。抗震救灾是一场与死神较量的生死大营救。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我们和时间赛跑、同死神抗争，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初心，也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中国珍爱生命、人民至上的价值准则。灾情发生以来，党和国家组织动员各方力量，始终坚持把抢救人的生命摆在第一位，开展了我国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最大限度地挽救受灾群众生命，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造成的损失，84017 名群众从废墟中被抢救出来，149 万名被困群众得到解救，430 多万名伤病员得到及时救治，1 万多名重伤员被快速转送全国 20 个省区市 375 家医院，1510 万名紧急转移安置的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排，881 万名灾区困难群众得到救助。这一系列数字背后，是一个个从死神手中抢回的宝贵生命，是一个个在大灾中感受大爱的温暖心灵，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为民、情系苍生的政治宣言和价值追求。强震发生之后，全国人民心系灾区人民，为每一个获救的同胞欢呼雀跃，为每一位遇难的同胞流泪哭泣，“汶川不哭，四川加油”的呐喊响彻大江南北，传递着每一个中国人对同胞的牵挂和祝福，体现出中国人民对生命的关怀和尊重。

尊重科学，就是弘扬相信科学、崇尚理性、勇于创新的时代精神，让科学为人类搏击灾难提供力量。在特大灾害面前，人类该如何应对和抗衡自然的“暴虐”？在抗震救灾斗争中，中国人民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灾难，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力量最大限度降低损失，最快速

度实现灾后重建。党和国家科学调度、全面统筹各方力量，人民子弟兵以高超技术克服空中和复杂地形挑战，医护人员以精湛医术全力救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救援人员充分运用现代救援技术和工具，全力抢修基础设施，及时处理和化解堰塞湖等次生灾害，切实做好余震监测、气象服务、科技支撑等后勤保障，及时准确公布灾情，消除谣言和恐慌。在灾后重建中，注重科学评估规划，组织实施对口支援，确保灾后重建依法有序，高效运行。无论是及时救援还是灾后重建，党领导全国人民充分发挥科技的重要作用，彰显了中国人民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不断进取、勇于创新的时代精神。

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依然可能布满风险考验。只要我们始终坚守和自觉弘扬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就一定能携手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作者：冯秀军，系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明末至民国年间应对疫病的财政措施 及其演变

马金华

《光明日报》（2021年07月05日14版）

疫病防治不仅仅是单纯的医疗卫生现象，更是关涉整个国民生存与国家治理的重要问题。疫病防治映射着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和面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财政应急能力，反过来看，政府对财政政策与财政实践的安排，同样影响着疫情防控的进程。明末至民国年间是我国历史上疫病高发期，也是在疫病防治特别是财政措施方面逐渐演变的时期。关注这一历史阶段重大卫生防疫事件中的财政举措，分析疫病冲击下的财政应对成效，可以对中国历史上的财政职能、国家治理能力的发展与演进产生一些新的思考。

明末至民国年间重大疫病的暴发及其影响

明末至民国年间，疫病发生的频率较此前明显增多，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据余新忠《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中国近世重大疫情与社会反应研究》的不完全统计，明朝后期至民国时期，376年间共发生485次瘟疫，平均疫病发生频率为1.29次/年。疫病影响范围之广，传染之快，破坏之大，难以尽述，其中以万历崇祯年间华北鼠疫、康熙时期北部地区灾疫、清末东北三省鼠疫、1932年全国霍乱四次重大疫灾影响最甚。

这一时期，瘟疫种类增多，以鼠疫、霍乱在传染性和致死率上最为严重。鼠疫因其易感染、潜伏期短、死亡率高的特征，对民众生命、社会心理都造成了巨大威胁和极度恐慌，影响极为严重。明末万历至崇祯年间，曾发生三次大规模鼠疫。万历八年（1580年），山西“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万历《山西通志》卷二十六《祥异》）。此次鼠疫持续不断，及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再次大规模流行，在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和山东诸省蔓延传播。清朝康熙七年（1668年）至康熙六十年（1721年），秦岭—淮河一线以北地区受自然灾害和战乱影响，共发生疫病17次，“人被疾疫，死亡相继”（《清史稿》）。受制于北部地区尚不发达的医疗手段与落后的思想观念，疫病突发之暴烈，症状之奇特，死亡之快速，给民众造

成了极为严重的心理恐惧与社会恐慌。1910—1911年东北鼠疫，据《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统计，黑龙江省死亡14636人，吉林省死亡22222人，奉天省死亡7114人，三省总计死亡43972人。霍乱于道光元年前后自印度传入我国，在江南一带迅速扩散。1932年发生全国性霍乱，无论就影响区域还是死亡人数而言，都是民国时期最大的瘟疫。当时，疫情以上海等大城市为中心，沿交通干线迅速蔓延全国。根据民国政府时期海港检疫处兼办的中央霍乱局估计：1932年的霍乱侵入23个省，感染者达10万人以上，死亡约34000人。

大规模疫病给社会政治、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一方面，大量人口患病或死亡所造成的社会劳动力锐减，使“农田无人耕种，禾熟无人收割”（《湖北省志·卫生》），农耕与社会生产难以进行，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同时，交通管制、患者隔离也使贸易往来与商业活动几乎陷入停滞。另一方面，疫病一旦流行，感染者便从社会的“生产者”转变为社会的“消费者”，国家在财政收入受损的基础上，还需花费大量财力和物力对疫病进行救治，面临财政和管理等方面的压力。

明末至民国年间重大疫病的财政应对措施

明末至民国年间，中国在数次重大疫病的冲击下，财政应对疫病的举措逐步完善和制度化。

明末万历至崇祯年间，山西等地鼠疫严重，囿于王朝腐败与国用不足，政府对公共卫生防疫的财政安排多表现为临时性财政救济政策。一方面削减非疫病救治的无关财政支出；另一方面提供大量银两赈济灾民，下拨防疫财政资金，用于医官选派、药材采买等医疗救治行为。同时，减免疫情所在地百姓的赋税，承担祭祀丧葬事宜，以缓解疫情之下百姓的生存困难。但由于政府缺少疫前防范的财政投入，医学与惠民药局常年经营不善几近废弃，疫时难以发挥效用。此外，中央财政赈济依旧存在一定的地域局限性，公共医疗救治服务供给不均。明末疫情防治始终处于被动，对万历崇祯年间山西鼠疫的紧急救援和财政应对，表现出危机之下的临时性、偶然性和不平衡性。

清康熙七年（1668年）至康熙六十年（1721年）间，我国北部地区受自然灾害和战乱影响，疫病频发。清政府针对当地物资匮乏、医疗落后的状况，采取施医送药、赈济粮米、拨发钱款，蠲免赋税等举措，并常常延续至疫病之后，其目的是运用财政工具缓解疫区百姓生活困境。康熙十九年（1680年），派遣太医院医生“分治五城抱病饥民”，“速行设法赈济”（《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旱灾与瘟疫同时发生，“蠲免二年钱粮，并仍发谷仓赈济”（《浮山县志》）。康熙朝还采取了“贵农重储”“戒奢崇俭”等措施，积极建设地方仓储。地方仓储的整顿发展，一定程度上使地方防灾抗灾的能力相对增强，在赈灾备荒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进入晚清，日常救治设施逐渐增多，专门防疫的医药局出现，政府逐渐依靠稳定而灵活的方式（丝捐、铺捐等）筹措防疫资金。可见，清政府对灾疫防范及其财政建设已开始重视并逐渐发展，以税收为杠杆的财政防疫应急政策逐步发挥作用，社会保障与相应的防疫财政初步兴起。

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东三省发生鼠疫，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疫情的社会保障措施：

发放棉衣、粮草等赈济物资以应民需；补贴银两、补偿疫区居民财产损失；降低水价，提供公共卫生用水，以避免因饮水不洁而致疫情加重。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纾解了东北地区的鼠疫困局，但也暴露了缺少防疫预算的国家财政在大疫面前应付不及的窘境。面对东三省急电中央的拨款请求，清政府不得不挪用外交财政预算以充防疫经费，继向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借款各50万两银元后，又商请向各国银行借债200万两。宣统三年（1911年），奉天特设万国鼠疫研究会，出版了《1911年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将中国防治鼠疫的实践经验和方法公诸世界，为世界各国妥善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实例。东三省鼠疫和万国鼠疫研究会的召开促成我国近代第一个常设防疫机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于1912年创办。清末政府综合运用财政应急工具，在实践中初步探索出疫病防治机制，财政作为防疫事业保障措施开始逐渐走向常态化。

民国时期，疫灾防治制度化建设逐渐加强。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卫生署，是为我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财政预算科设立防疫经费，从制度上保证了疫情财政的应急经费来源，也为拨付核算提供了行政依托。1932年4月，一场全国性霍乱暴发，国民政府成立预防霍乱联合办事处，财政部作为协同部门负责统筹、调配抗疫所需的资金和物品。霍乱疫情沿铁路干线传播，全国海港防疫管理处立即令广州、厦门、青岛等各港口城市“遵照海港检疫章程，由检疫关实行检查”（《大公报》1932年6月13日）。在西方医疗卫生理念的影响下，卫生防疫财政支出的重点转向了疫苗接种、隔离室修建、卫生防疫宣传、医护人员津贴，以及清洁用水供给、消毒液喷洒、厕所改良等公共卫生服务。但受制于国势衰微、财政不足，霍乱防治诸项工作皆因设备、人力及经费有限而难达预期。社会救援作为政府财政的补充，参与到疫病的防治与救助，其中以公益组织、工商社团、社会名流贡献较为突出。1932年7月30日《申报》记载，上海吴醒亚等人筹设时疫医院，杜月笙创办高行时疫医院，对贫者均施义诊。新药同业公会于1934年扩充其主办的黄楚九医院，为贫民患者免费施医赠药。但社会救援力量存在一定的地域局限与经济约束，基本集中于长三角等经济发达、思想开放的富庶之地。限于财力或其他原因，免费接种疫苗只在一些大中城市开展。这一时期银行借款、增发外债也成为财政资金筹措的手段，社会力量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当然，因为当时动荡的时局诸因素影响，这些措施的效果仍然十分有限。

总结与思考

每一次疫病的发生与救治，都是对财政制度和国家治理的冲击与考验。明末至民国年间，我国在应对重大疫病这一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上，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逐步建立了一套国家主导的卫生防疫机制。财政在应对疫病中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不同朝代实施了不同的财政应对措施。具体而言：其一，从明末的消极避疫到清初的积极防疫，再到民国时期的防疫制度化，从明末的临时性救治到晚清民国的日常性诊疗，政府财政举措的主动性逐渐加强；其二，从单纯的税收减免、府库拨款，到压缩政府支出、设立预算防疫经费再到借款举债、救援协助，卫生防疫财政收入的筹措手段更加多元；其三，从一城一地的公共物品提供与财政定向补贴，

到参与国际交流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卫生防疫财政支出的辐射范围有所扩展；其四，从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单一财政投入，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出资，卫生财政格局初具雏形；其五，近代财政应急制度呈现西方化与本土化融合态势，既受西方公共卫生思想传播的影响，亦有中国传统经验之传承。

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对于财政工具的充分挖掘与综合利用，使得应对疫病的公共卫生财政逐步系统化、制度化。回顾历次重大疫情防治经过，卫生防疫建设虽然取得了较大进步，但诸多举措囿于体制滞后、经费不足及风俗落后，依然存在诸多局限与现实困境，最终导致应对疫情的效果有限。

（作者：马金华，系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代中国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划分研究”〔20AJY018〕阶段性成果）

上好党史大课 培育青年先锋

冯秀军

《光明日报》（2021年07月09日06版）

1 青年是百年党史的青春传唱人

翻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画卷，在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三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事件中，青年从未缺席。他们始终是勇立时代潮头、勇担时代重任的主力军，标志时代的青春符号、引领时代的青年先锋，也是百年党史的青春传唱人。

一百年前，一批心忧民族危亡、心系劳苦大众的先进分子在石破天惊中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他们率先觉醒、上下求索，终于取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经，从此改写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开启中国革命从被动转向主动的崭新篇章。一群新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思想火炬，照亮了近代以来长期为黑暗笼罩的中国。从北大红楼到南湖红船，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斗争，从瑞金建都到万里长征，从艰苦卓绝、鬼泣神惊的抗日战争到摧枯拉朽、翻天覆地的解放战争，一批批中国青年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在前线、在敌后，用刀枪、用纸笔，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战，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战，他们用英勇顽强的不懈斗争，赶走日本侵略者，推翻蒋家王朝，用生命和鲜血换来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中国。

面对一穷二白的战争废墟，面对建设和保卫新中国的新使命，新中国的青年又一次站在保家卫国、建设祖国的前沿阵地。“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抗击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一批批青年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投身抗美援朝战争。这场立国之战，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打出了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骨气、底气和自信。为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一支支青年突击队投身祖国建设主战场，在各个行业战线拼搏进取、勤奋工作。为摘掉中国“贫油”的帽子，大庆石油工人发出“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为突破西方国家的“核讹诈”，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以身许国，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在茫茫戈壁荒原，经受生命极限的考验，突破尖端技术，取得“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青年是其中的重要力量。一代代青年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接续奋斗，为新中

国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青年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以勇立潮头的豪情，投身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恢复高考后勤奋苦读奔赴考场，渴望用知识建设祖国、改变命运的青年；打破铁饭碗，勇敢投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创业青年；敢打敢拼、绝不言败，打败东洋魔女神话、打出中国人精神志气，开创“五连冠”奇迹的中国女排；突破“姓社姓资”束缚，率先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深圳创业者……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青年始终是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改革创新的主力军。他们大胆地试、勇敢地闯，干出了一片人生新天地，也描绘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

新时代青年扎根祖国、心系人民，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同向同行，以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建功立业。从高科技创新的神舟团队、嫦娥团队，到戍边卫国、寸土必争的三军将士，从脱贫攻坚的驻村干部、支教教师，到投身疫情防控的医护人员、快递小哥、志愿团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征程中，广大青年始终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和突击队。

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征程，不难看到，我们党取得的所有成就之中都凝聚着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热情和奉献，中国青年始终站立时代潮头，承载祖国未来和民族希望，肩负时代重任，成为百年党史的青春传唱人。

2 百年党史是青年成长的人生大课

百年党史既是一部记录中国共产党人栉风沐雨、奋斗前行的煌煌史书，也是一堂激励新时代青年奉献祖国、成长成才的人生大课。党史中既蕴含着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历史智慧，也包含着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的深刻道理。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应培育和引导广大青年自觉汲取百年党史中的深厚精神营养，努力上好百年党史这堂人生大课，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规律，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青春责任。

百年党史是一堂信仰大课。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是无数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信仰、捍卫信仰的过程与结晶。无论是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还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矢志不渝、九死不悔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都是毕生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以一生兑现信仰承诺的光辉典范。他们用自己追寻信仰、确立信仰、捍卫信仰、践行信仰的一生向新时代青年说明一个深刻道理：信仰是人生的压舱石，只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才能为青春成长赋能定向。

百年党史是一堂修养大课。每个时代的青年都有自己的人生际遇和时代责任。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青年先锋用他们的青春成长历程告诉当代青年，明大德、知是非、大格局、有境界是青年担当起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的重要基础。一个人在青年时期树立怎样的人生理想，确立怎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奠定怎样的思想基础和道德修养，将决定他一生的奋斗方向。少年毛泽东以诗明志，写下“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豪言壮语；青年周恩来立下“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青年习近平在梁家河

的七年知青岁月奠定了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思想基础和人生方向……百年党史中有无数值得新时代青年学习追随的青春榜样。

百年党史是一堂奋斗大课。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 50 多名党员，今天已经成为拥有 9500 多万名党员、领导着 14 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生动展示和深刻诠释了星火何以燎原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无数共产党人为了国为民不懈奋斗的恒心与行动。“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正是共产党人伟大奋斗精神的生动写照。救民族于危亡，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于将倾，需要不惧流血牺牲的奋斗；突破西方的制裁封锁，在战争废墟上建设家园，需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奋斗；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化危为机、开创新局，需要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奋斗。一百年的党史告诉青年一代，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险阻，奋斗才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奋斗才是青年人应有的样子。

3 上好党史大课，厚植家国情怀

在信仰大课中激发信仰。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也是激励青年自觉担当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的力量之源。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要善用建党百年的伟大成就，向青年充分证明和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要善用百年党史中的“信仰故事”来彰显“信仰力量”，从“信仰人生”来证明理想信念之可贵，引导青年从党史学习中激发信仰，坚定自信，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树立为祖国为人民永久奋斗、赤诚奉献的坚定理想。

在修养大课中砥砺品格。品格修养标注人生境界和高度，也为青年健康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石。百年党史中无数共产党人舍小家为大家、舍小我成大我的高尚道德情操，铸就了一座座感人至深的精神丰碑。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应当用好宝贵而生动的修养大课，引导青年自觉从党史学习中获得启发，锤炼品德，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自觉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根铸魂、启智润心，加强道德修养，明辨是非曲直，增强自我定力，矢志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

在奋斗大课中汲取力量。无奋斗，不青春。“创新”“奋斗”是新时代青年人最美的样子。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应引导青年自觉从百年党史的大课中汲取不懈奋斗的力量，勇于创新、敢为人先、敢于突破、砥砺奋斗，以聪明才智贡献国家，以开拓进取服务社会。在实学实干、埋头苦干中致敬“前浪”，在追求卓越、肩负时代重任中成为勇立新时代潮头、不负壮美青春的“后浪”。

（作者：冯秀军，系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林光彬

《光明日报》（2021年07月20日11版）

党的十九大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是党中央提出的又一个重要阶段性发展目标。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庄严宣告：“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021年6月10日，党中央与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这表明我国推进共同富裕正在加速。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实现共同富裕，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随着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共同富裕不是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的富裕，是要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普遍达到生活富裕富足、精神自信自强、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构想，共产主义社会将彻底消灭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立一百年来，我们党始终带领人民为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懈奋斗。党的一大提出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统治，为建立现代国家工业体系创造条件，并把消灭阶级差别作为奋斗目标之一。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提出了我国发展富强的目标，指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为中国的经

济发展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让中国开始富了起来。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江泽民同志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胡锦涛同志也要求，“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迈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实任务，必须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作出更加积极有为的努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向着更远的目标谋划共同富裕，提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

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有了更加坚实的发展基础

推进共同富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发展质量效益，改善居民生活品质，我们还面临不少艰巨挑战。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教育科技的现代化水平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我们是在一个更高起点、更高平台上推进共同富裕。

工农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经济发展实现历史性飞跃。2020 年我国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比重达到 28.1%，连续 11 年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工业生产发展水平达到了新高度。据统计，我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钢铁、建材、纺织、服装等 7 大类行业规模名列全球第一，装备和电子信息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220 多种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在农业发展方面，农业科技贡献率超过 60%，主要农作物耕种收机械化率超过 70%，全国粮食作物亩产量 382 公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超 470 公斤，远超国际安全标准线 400 公斤的标准。也就是说，我国工农业生产水平已经解决了供给不足的问题，经济发展进入到追求品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教育及科技的发展基础更加雄厚。我国总人口数量达到 14 亿多，其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2.1836 亿人，每年高校毕业生和海外回国留学生总计近 1000 万人，高等教育正在从大众化快速向普及化发展。全国研发人员总量已连续 8 年稳居世界第一位，2013 年开始 R&D 经费投入稳居世界第二，科技研发投入强度 2020 年达到 2.40%，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 2.37% 的平均水平，近几年每年申请的专利数量和增长速度均居世界第一，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接近 60%，诸多领域都取得重大成就，创新型国家建设加速推进。

经济发展与收入水平稳步提升。2020 年，我国 GDP 总量达到 101.6 万亿元人民币，占世界经济比重超过 1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72447 元，人均可支配收入 32189 元，城镇化率达到 63.89%，居民人均预期寿命 77.4 岁，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5G 技术与应用普及世界领先。2019 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 39.8 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 48.9 平方米。中等收入群体已达 4 亿人，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保障覆盖面超过 99%，建立起了覆盖城乡所有人口的世界最大社会保障体系。

以新发展理念指导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实现共同富裕，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事实”。为此，全国上下、中央与地方、各行各业都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通过创新发展解决经济发展动力问题。促进收入增长、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速度、效能和可持续性则依赖于发展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全面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推进共同富裕的方方面面。通过创新处理好经济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使经济增速保持在较高水平，保证高水平的就业率，这是缩小贫富差距并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占比的必要条件。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做大国民经济蛋糕，从而提高收入水平，增加工资性收入在 GDP 中所占份额奠定坚实基础。

通过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协调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全面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必须树立协调发展理念，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推动区域、城乡以及社会各阶层、各行业之间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发展的整体协调性。促进协调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对各方面工作进行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助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通过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更高要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绿色低碳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构建一体谋划、

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机制，推进生产生活绿色转型，为造福人类永续发展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闯出一条新路。

通过开放发展促进经济内外联动。当前，我国的产业链和需求市场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国既是世界第一生产国，又是世界第一贸易国，是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外贸带动的就业人数达到 1.8 亿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顺畅稳定，推动形成顺畅的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形成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更好地服务和引领世界经济发展。

通过共享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中，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全体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重点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首先，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其次，兼顾社会公平正义与发挥资本效率，将资本的利润动机与收益追求规制在符合社会主义价值选择的框架内，建立健全一系列规制资本的制度，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肆意扩张，防止贫富差距的固化。最后，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初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速相匹配；二次分配利用好税收等政策工具，对高收入群体进行精准调节；发挥好财政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对口帮扶等专项制度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功能，着力提升弱势群体、低收入群体和贫困地区的自主发展能力、综合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受教育水平。

（作者：林光彬，系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如何理解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

王立勇

《光明日报》（2021年08月10日11版）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这一表述确定了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宏观调控的基调和宏观政策的基本态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是相对于逆周期调节而言的，是对逆周期调节的拓展、完善和升级，有利于提高宏观政策的前瞻性、精准性、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和有效性。

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给经济发展带来更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其中，很多关键问题表现出中长期的特征，比如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创新驱动等，这使得以应对短期经济波动为主的传统逆周期调节框架显得捉襟见肘，跨周期调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不是对逆周期调节的否定和摒弃，而是对其的拓展、完善和升级，是在充分把握逆周期调节的局限性基础上提出的调控框架或体系。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强调通过经济政策的制度化设计，既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又重视未来长波段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政策的有机协同，兼顾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从而更加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强调宏观政策更加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机制化，要求将政策意图更加清晰地传递到市场主体，稳定市场和社会预期。上述特征，使得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能够突出解决困扰经济发展的中长期问题，有利于提高宏观政策的精准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是我国宏观调控及相关宏观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通常认为，主要的宏观调控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对经济进行“逆周期”调节，以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调控目标。因此，传统的宏观调控更多体现的是对经济的“短期”调节。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打破了这一传统，旨在建立和完善一套站位更高、侧重解决中长期问题的宏观调控框架，将宏观政策由“短期视角”和“速度视角”拓展到了“中长期视角”和“质量视角”。这是我国在宏观调控领域的理论创

新和制度创新，充分展示了中央的市场经济驾驭能力和宏观经济治理能力。

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有助于保障我国经济继续保持长期向好态势。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我国经济出现大幅波动，但外来冲击不会改变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依然面临创新动力不足、经济结构失衡、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等中长期问题。在“十四五”时期乃至今后的中长期经济周期内，宏观政策既要看到短期的疫情冲击等因素，努力将影响降到最低；还要侧重于解决中长期问题，兼顾长远目标和利益。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能够针对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即关注短期的逆周期调节，更着力解决中长期问题，以短期和中长期目标的协调配合来谋求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使调控政策更具针对性和战略性。

二

在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的框架下，我国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和实施路径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从政策目标看，更加重视目标制定的机制化，更加关注中长期目标，强调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以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结构转型升级、风险累积和传导路径等有更加清晰的认识，能够对相关部门的政策搭配提供更为明确的指引，有效避免长短期、多目标调控下的目标冲突和不协调。

从政策工具看，提高了政策运用的机制化水平，强调财政货币政策与中长期战略规划、区域和产业等政策间的协调与配合。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更加重视健全以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是在充分利用市场手段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通过先行的系统规划设计，妥善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等中长期问题，促进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调控模式看，更加注重政策的规则式调控。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在服务于中长期目标的前提下，以规则为基础兼顾灵活性，强调规则和相机抉择的统一。换言之，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并不是一味强调规则和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放弃或忽视政策的灵活性，旨在根据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和经济景气循环相机而动、实时调控，从中长期或跨周期视角评价政策指标的高低和政策风险水平，如赤字水平、债务率、宏观杠杆率等。

从政策关系看，更加重视政策之间的搭配和协同。一方面，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并不意味着对逆周期调节的摒弃，而是在跨周期调节大框架下仍重视发挥逆周期调节的功效，重视二者的有效搭配和协调统一。虽然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更加注重中长期目标，然而对疫情、自然灾害、贸易摩擦、大国冲突等突发情况带来的短期经济扰动也仍要做好逆周期调节设计，即强调在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的框架设计中做好逆周期调节预案，促使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和实现中长期经济发展目标有机衔接。另一方面，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涉及的政策体系和调控工具更加丰

富，涉及部门更加繁杂，从而更加重视部门沟通和政策协同，重视构建科学合理的政策搭配和协调模式，确保跨周期和逆周期政策组合的施力点恰到好处，形成协调统一的政策目标、方向、力度和科学合理的搭配机制。

从传导机制看，更加重视政策的预期传导，有利于降低宏观政策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对我国经济发展长短期目标的实现存在较大影响。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更加关注政策波动性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关注政策调控背后可能潜伏着的代价，重视稳住并引导微观主体或市场主体的预期，以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理顺政策的预期传导机制、降低不确定性，是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的优势所在，也是宏观政策跨周期设计的关键内容。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重视从中长期视角加强预期管理，加强公众沟通，着力稳定市场预期，给企业及微观主体更大自主权、更大发展空间、更大活力，以增强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信心和热情。

从政策评价看，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效果的评价内容更加丰富，不仅包括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的整体效果、各项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工具实施方向和力度与调控目标的契合度，还包括分周期调控目标值和中长期目标值的科学性、分周期调控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的吻合度、各项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的协同效果、宏观政策风险的跨周期评价和监测等。通过一系列的评价和监测，能够确保各类长短期宏观政策形成集成效应，提高宏观政策的精准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确保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目标的顺利实现。

（作者：王立勇，系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副院长）

做好促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 “财政文章”

马海涛

《光明日报》（2021 年 10 月 12 日 11 版）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省、市、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 1.6 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累计投入 6601 亿元。实践证明，发挥财政资金投入的主体和主导作用，特别是中央和各级财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是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保障。在阔步进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同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政策要继续发挥有效衔接、着力保障的重要作用，在推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过程中更加积极有为，既要扎实做好基础性和兜底性工作，又要充分发挥引导和协调功能，花好每一分钱，提高财政治理效能。

把握好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辩证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实施乡村振兴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脱贫攻坚基础上继续推进，只有扎实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才能在战略转换过程中有效杜绝重复建设，提高各类资源使用效率，高质高效地推动政策目标有序实现。为此，财政政策应持续加力不放松。支持脱贫地区发展的财政投入力度应继续保持总体稳定，切实保障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延续扶贫开发投入力度，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中央基建投资用于乡村振兴的资金等，增长幅度要维持在脱贫攻坚时期的水平或进一步发力，中央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各类涉及民生的专项转移支付，要持续向原贫困地区倾斜；省级财政和原对口扶贫的东部地区仍要维持投入强度。

只有把握好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两大战略间的辩证关系，才能明晰乡村振兴财政政策的发

力方向，真正做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要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深化农村改革、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脱贫攻坚的要旨是解决局部问题，即在局部贫困地区解决基本生存问题；而乡村振兴的要义在于全局发展，即通过总体性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实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从而推进共同富裕。为此，财政政策的设计也要与之相适应，做好财政资金“存量”和“增量”文章。在存量方面，充分利用好脱贫攻坚时积累的涉农资金管理与使用机制，进一步综合利用好使用脱贫攻坚专项资金的长周期、远期收益项目，确保存量财政资金在推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中发挥最大效益和长期效果。在增量方面，围绕上述工作部署，持续提高财政投入强度和精度，特别在重点环节和领域上予以财政资金倾斜，从大规模“输血”式资金转移转为加大财政资金投入的杠杆与指引作用。

在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中发挥好财政政策的重要作用

充分发挥财政治理效能，加强和保障乡村基层治理能力，为推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保驾护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四五’时期，要在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上下更大功夫。要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基层工作的全面领导，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广大农村地区贯彻党的思想、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基础力量。财政政策应重点考虑从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出发，为改革完善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提供激励与保障机制。具体而言，各类财政资源要更多向基层倾斜，地方各级财政应优先保障村级党组织运转经费，适度考虑提升基层村干部的基本待遇及生活补助，最大限度借助财政手段加强和保障乡村基层治理能力。

提升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必须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公共性，全面有效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注重加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当前我国城乡差距最直观的体现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差距，严重阻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长期以来，农村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限，加之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通常所需资金量大、建设周期长、投资收益低，导致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不足。因此，财政政策一方面要把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作为主要着力点，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明确阶段性突破点，加大对重点短板项目的财政资金倾斜力度。另一方面，应更加注重对涉农财政政策的绩效管理，统筹涉农财政资金，强化中长期规划，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明确阶段性突破点，在顶层设计上做到有重有轻、有急有缓、循序渐进。推动建立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制，逐步实现公共服务支出标准化，硬化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财政资金的绩效评价，落实“花

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此外，注重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供给主体多元化。推动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协调配合，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资金引导、杠杆撬动、风险兜底的作用，为加速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助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政府投入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发挥金融资金的引导和协同作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所需资金量巨大，财政资金应注重与金融政策协调配合，以财政资金为锚、金融手段为杠杆，采取有效手段保障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所需的资金量，尤其是助力农民、农户更便捷地获取金融服务，这是稳住农业基本盘、保障粮食安全的有力手段。健全财政风险补偿、风险分担机制，适当提高财政的补偿标准和分担比例，充分调动金融机构资金的积极性，引导其在整体上承担金融的信贷风险的同时，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支持成立政府出资的担保机构，扩大扶贫贴息贷款规模，撬动更多信贷资金支持农民发展生产和就业创业。此外，审慎考虑提高乡村振兴专项债发债规模，适时扩大乡村振兴专项债项目范围，为构建乡村振兴多元投入格局提供支撑。

构筑产业兴旺与人才振兴的循环格局，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发展乡村产业，顺应产业发展规律，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优化产业布局”，“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能否发挥财政政策的协同作用至关重要，为此必须在多个关键点同时发力。一方面，财政政策要体现因地制宜的灵活性与特殊性，着力在培育地区特色优势产业上下大功夫，为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供支撑，让农业成为极具发展潜力的行业。另一方面，财政政策要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所需的人才投入提供财力保障，通过加大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力度，支持企业搭建人才培养平台，予以优秀毕业生、技能人才、科研人员、小微创业者、高素质农民等各类人才就业创业财政补贴等政策，激发人才创新活力，进一步促进农村特色产业兴旺发展。

兼顾构建生态宜居、文明有度的美丽乡村，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创造文明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科学知识，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在保护好生态前提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把生态效益更好转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精神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同样需要财政政策予以支持。重点包括：一是统筹布局农业、生态、文化等空间，科学划定各类空间管控边界，强化城乡公共生态、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把文化保护传承和生态开发利用结合起来，赋予中华农耕文明新的时代内涵。二是因地制宜，分层分类促进生态农村、文化名村建设，完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施精准建设。三是推进乡村文化、生态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引入社会资金发展农村旅游业，把乡镇建设成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实现县乡村功能衔接互补。

（作者：马海涛，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把握数字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

孙宝文 欧阳日辉 李涛

《光明日报》（2021 年 10 月 12 日 11 版）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的发展会带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学视野中的技术经济特征，即是分析新技术的创新与使用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数字经济在基础设施、生产要素、生产和服务方式等方面表现出与以往经济发展明显不同的特征和规律，既涉及技术创新，表现出独特的技术新特征，又涉及经济发展范式创新，突出表现为新经济的一系列特征。把握数字经济的内涵，必须从技术特征入手，分析数字技术的创新和使用带来的生产方式创新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

智能互联是数字经济新基础设施的主要特征

数字经济底层架构的核心是连接，所以，发展数字经济必须高度重视信息、融合、创新和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把设备、生产线、工厂、供应商、产品和客户紧密联系在一起，打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

智能和互联是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最显著的特征。智能的发展方向主要体现在产品/服务智能、装备智能和过程智能三个方面；互联的发展方向是人、企业、政府机构、物品智能互联的自适应、生态化网络。

万物互联加速了生产要素在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用户与产业、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流动，通过连接数的增加、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应用场景的拓展，市场主体运用技术和数据形成了新的经济形态，如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算法经济、零工经济、数字服务等。比如，电子商务平台是面向农业、工业及服务业的交换和消费过程，电子商务的安全认证、在线交易、物流配送、支付结算等都必须基于开放共享、智能互联的网络平台。

在智能互联的驱动下，产业结构将呈现为以电子商务为核心的消费互联网和以无界制造为核心的产业互联网。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都是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消费互联网注重与消

费者的连接，产业互联网强调数字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本质上是连接企业。

数据成为数字经济新的关键生产要素

不同的经济形态，生产要素所包含的内容有很大不同，关键的生产要素也不同。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在数字经济的研发、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经济环节中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

首先，数字经济始终围绕数据这个核心生产要素的感知、采集、传输、存储、计算、分析和应用，来重构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对传统流通、消费、生产体系的淘汰、升级、融合、重组、优化等作用，其背后的经济逻辑都必须基于对数据的判断、预测和精准匹配。

其次，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具有即时性、共享性、边际生产率递增等特征，数字技术与传统生产要素相融合，可以通过算法优化传统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提高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公共资本、土地、技术等其他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进而有利于实现递增的规模经济报酬。比如，Airbnb 租房、Uber 打车等共享经济模式的本质，就是挖掘数据的价值，基于数据构建新型的合作和信任体系，实现智能化匹配供需的目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最后，在数据、算法和算力的驱动下，数字经济可以实现线上线下全网、全域、全渠道，端到端的全链条、全流程、全场景的连接，打造丰富的人与机器无缝衔接的应用场景，使人工和机器的分工合作达到高效的协同水平。比如，商业银行构建客户互动层、AI 决策层（AI 中台层）、核心系统与数据中台层，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客户进行精准画像，实现精准定价，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无抵押的数字信贷。

融合是新生产或新服务方式产生的前提

数字化环境下，无处不在的传感器、嵌入式终端系统、智能控制系统、通信设施通过物理信息系统（CPS）形成一个智能网络。通过这个智能网络，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服务与服务之间，能够形成一个互联关系，从而实现横向、纵向和端到端的高度集成。

在数字经济范式下，通过对经济社会运行机制进行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系统性重塑，可以实现人机协同、产业跨界协同、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融合。比如，无界制造就是基于开放共享、智能互联装备，将农业种植养殖、工业制造过程进行跨界融合的智能互联制造系统，是云制造、智能制造、网络制造、数字制造的集成化和系统化。

在数字经济范式下，智能技术群是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基本驱动力，在数字产业化过程中不断实现数字技术的融合创新，以多种技术的集成形成乘数效应。比如，数字孪生通过整合实体、数据、技术三大核心要素，可以构建物理实体、虚拟实体、孪生数据、连接和服务五个维度的数字孪生体系架构，但其实现的前提便是需要集成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

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数字技术。

在数字经济范式下，通过集成改变了用户发现、商品及服务购买、生产制造等方式。例如，微信集成了生活服务信息，可以实现打车、购物、预约挂号、租房、防疫、支付、转账、信贷等功能。再比如，航空、石化、钢铁、家电、服装、机械等行业出现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汇聚共享并有效整合了产品设计、生产制造、设备管理、运营服务、物流和售后服务等方面的数据资源，在融合发展中呈现跨界运营、价值共创和产用融合等横向分层的特征。

融合创新催生新业态和新模式

基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实现了创新发展，表现为一系列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涌现，跨界融合创新是数字经济创新的典型特征。

数字经济是以人为本的经济，注重用户需求的个性化满足、用户体验提升、用户潜在福利的挖掘。数字经济范式下，通过融合创新涌现的共享经济、数字贸易、零工经济、新零售、在线消费、无接触配送、互联网医疗、网络教育、一站式出行、共享员工、远程办公、“宅经济”等新业态，能够让老百姓共享数字经济创新的成果。

在数字经济范式下，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亦是制造业创新发展的过程，基于数字技术的制造技术、产品、模式、业态、组织等方面的创新层出不穷，制造业也因此实现了从技术创新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再到业态创新，最后到组织创新的过程。智能制造和车联网便是数字经济极具潜力的创新领域。

跨界融合是数字经济业态创新最常见的方式。数字平台作为数字经济最重要的组织形式，营造了数字空间与物理世界互联互通的数字生态，平台、企业、用户、政府和其他参与者形成价值创造共同体。比如，电子商务带动了消费、贸易、支付、仓储、物流、快递、广告等相关行业的快速增长，催生跨境电商、微商、小程序电商、直播电商、社区团购等新业态。

数字化转型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的重要抓手。数字经济在消费领域跨越了时空限制，在生产领域延伸了产业链，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2020年，中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7.5万亿元，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31.7万亿元，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37.21万亿元，电子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规模达到5.45万亿元，工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数字化转型为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提供了重要引擎，有助于实现内生性的经济增长。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意味着整个制造业生产形态的转变，即从大规模生产转向个性化定制，整个生产过程更加柔性化、个性化、定制化。农业的数字化转型，既要通过数字技术提升农业生产

能力、管理水平、生产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又要通过农业电商体系实现产—供—销精准对接，改造传统农业管理模式、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产品销售效率，从而助力农业经济健康绿色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国政府积极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开展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建设、支持创建数字化转型开源社区，就是要通过数字技术与金融、物流、交易市场、社交网络等生产性服务业的跨界融合，促进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营管理、销售服务等业务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全渠道、全链路供需调配和精准对接。

以治理体系创新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数字技术快速更新迭代，既为经济体系数字化转型提供充沛动力，也使得数字经济面临来自互联网技术领域风险的威胁。数字经济的风险主要表现在高度集成的信息系统安全风险、数据泄露风险、企业数字化转型风险等，产业数字化转型中出现的新旧更迭、优胜劣汰亦会对经济运行造成冲击、带来不确定性，大型平台企业“大而不能倒”的运营风险、垄断风险和资本无序扩张等问题也与数字经济的发展相伴而生。这些风险会对个人信息安全、人身和财产安全、创新发展、产业安全等造成威胁。这些问题的出现，与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行业自律不健全，规制无法跟上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进而损害了互联网企业之间公平有序的竞争态势不无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监管制度”，这是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作出的重要决策。

（作者：孙宝文 欧阳日辉 李涛，均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让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在伟大复兴征程上 熠熠生辉

哈战荣 牛子谦

《光明日报》（2022 年 01 月 11 日 06 版）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是一个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获得智慧、凝聚力量、勇敢前行的政党。每到重大历史时刻和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都会以史为鉴，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总结经验与教训，形成共识与合力，带领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奋勇向前。1945 年 4 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 1981 年 6 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我们党正确运用唯物史观和党史观梳理历史脉络、总结历史经验的鲜活实践。两个决议都是在重大历史关头作出的，都推动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走上康庄大道，取得重大成就。2021 年 11 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深刻总结了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所积累的十条宝贵历史经验。这些经验不仅是我们党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而且是我们党取得重大历史成就的政治密码，需要继续坚持与大力弘扬，使其在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继续发其力、展其彩、生其辉。

坚持党的领导。万山磅礴，必有主峰。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一百年来我们取得所有重大历史成就的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华巨龙开始觉醒、腾飞，中国人民走上了自立自强、扬眉吐气、建设家园的道路。世界发展的格局和态势也因中国的崛起而改变，世界人民也因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而受惠、获益。在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不断、障碍频频的情势下，要想治理好管理好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朝着共同的目标脚踏实地、统一行动，就必须继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凝心聚力继续前进。

坚持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

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始终坚守并践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谨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信条，书写了一部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惧艰难险阻、战胜风险挑战、夺取伟大胜利的壮丽篇章。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继续坚持人民至上，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让人民在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中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使我们党的事业建立在坚实的民心根基之上。

坚持理论创新。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一百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国人民愈挫愈勇，不惧挑战，完成其他政党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取得一次又一次彪炳史册的伟大胜利，归根结底在于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根据变化的实际实现理论创新，并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我们相信，只要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加强大、更具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坚持独立自主。党历来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逐步开拓了一条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历史深刻表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照搬外国模式，也没有简单套用其他国家发展模板就可以发展得很好的成功范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虚心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又坚定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不信邪、不怕压，就一定能够把发展的主动权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路子越走越宽，机会越来越多，前途也会愈加光明灿烂。

坚持中国道路。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实现中国梦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走这条能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顾百年历程，我们披荆斩棘、风雨无阻、阔步前行，仅用几十年的时间便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不懈探索和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传承 5000 多年悠久文明的基础上走出来的，是我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必须坚持，也要勇于坚持。

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为使命担当。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扩大开放、不搞关门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更不会为了一己私利损害其他国家人民利益，始终弘扬国际主义精神，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只要我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牢牢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一起真正肩负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使命，就一定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力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坚持开拓创新。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充满活力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伟大的事业，往往越是充满艰难险阻，越是需要开拓创新”。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上下求索、日益进取，不断通过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总结实践经验反哺理论创新，实现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不断推进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百年历史证明，只有不断开拓创新，敢于攻坚克难，勇于推进改革，及时识变应变，以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推动实践创新，才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坚持敢于斗争。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伟大斗争史。一百年来，我们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成长、在斗争中壮大、在斗争中成熟，锤炼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斗争不仅表现为一种精神和意志，更体现了一种方法和艺术。我们不仅要保持昂扬的斗争精神，更要提高斗争本领，掌握斗争艺术，加强顶层设计，科学排兵布阵，在新的伟大斗争中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抓住机遇，不断成长，进而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推动“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坚持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政治联盟，是党带领人民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党始终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在新时代征程上，我们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继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持续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推动统战工作的发展迈向新的更高的台阶，凝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伟力。

坚持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鲜亮底色，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强大武器。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只要我们及时祛除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各种因素，不断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实践本领和党员的党性修养，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始终坚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革命品质和政治本色，就一定能够确保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作者：哈战荣、牛子谦，分别系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讲师）

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

林光彬

《光明日报》（2022 年 05 月 10 日 11 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尤为重要。



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指出，资本只能作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统一”来理解。他把资本看作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不断地在运动中谋求自身增值的价值。马克思揭示了资本赚钱的秘密，发现了剩余价值，认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自然法则一样起作用，并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层面，解释了资本的特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特征，科学论证了资本运动的规律，科学说明了资本生产规律、资本积累规律、资本集中规律、资本循环周转规律、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两极分化，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

根据马克思资本理论，资本主要表现有以下特性或行为规律。

其一，资本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工具。资本是人类发展的经济手段和重要生产要素，并决定着市场经济下的分配形式。资本的形态随着生产方式和技术手段的发展而演化，经历了农业时代的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工商业时代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信息时代产融结合的混合资本、金融垄断资本、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等。为了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家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降低商品成本的动机。因而，资本在开拓市场、促进创新以及提高供给数量、结构和质量等改善人类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使人类从农业时代的短缺经济中解脱出来，创造了工业时代物质丰裕的社会。

其二，资本所有者只为有效需求进行生产。有效需求就是有钱并愿意购买的那部分人的需求。在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只要有足够的钱，任何你想要的商品和服务，资本所有者会想方设法供给满足。资本的目的是使剩余价值或利润最大化，因此在积累规律和收入分配法则的支配下会扩大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难以克服的基本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超越了这个特性，因此能够在实现全面小康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其三，产融结合是资本发展的一般规律。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互相渗透的客观现象呈现出一种规律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实体产业与金融业在经济运行中为了共同的发展目标和整体效益，通过参股、持股、控股和人事参与等方式进行内在结合。这种结合具有渗透性、互补性、组合优化性、高效性、双向选择性等特征。产业是实体产品和实体服务，产业是皮、是体；金融是基于实体产品与服务创造出来的金融产品、金融服务，金融是毛、是魂，毛要附皮、魂要附体，经济才能行稳致远，如果魂不附体，金融自我循环，就会脱实向虚，酿成系统性风险，进而演变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由于现代商业周期基本靠信贷维持，因此金融也被称为现代经济的血液循环系统。离开实体这个肉身，空有血液循环系统也支撑不起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规范资本行为界限，保障市场秩序良性循环，统筹做好产业与金融的各自发展和融合发展。

其四，资本自身的运动逻辑蕴含着社会的两极分化。在市场经济中，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存在深刻的矛盾。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支配下，一边是资本的积累，一边是贫困的积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必然形成贫富分化的两极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发展阶段后，贫富两极分化与金融业扩张有着非常强的正相关性。一些研究指出，当代世界呈现三个特征鲜明的两极分化，即信用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两极分化、真实收入和财富的两极分化。这些两极分化与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背道而驰，因此必须对资本这个工具、手段进行必要的规制，对资本运动进行必要的引导与约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也要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通过社会主义所有制、收入分配制度、财政金融制度等把两极分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其五，垄断资本的出现进一步加大金融危机的风险。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本寡头用信用扩张掩盖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用信用或债务杠杆的扩张与收缩强制进行经济的再平衡，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周期性地出现。在寡头垄断组织占支配地位的背景下，自由竞争的资本运动规律也演进到了垄断、国家垄断、甚至国际垄断资本的运动规律。我国一方面要应对国际垄断资本运动的外在竞争和压迫，另一方面也要权衡国内资本垄断与竞争的平衡发展，更好发挥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生产要素的功能。

二

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作为生产要素，具有一般性；另一方面体现生产关系，具有特殊性，在不同的国家和制度下，又具有个别性。资本也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作为发展工具、手段的资本，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当然也可以用，关键是要把资本利用得好、利用得更有经济效率、利用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导向，引导其为人民的美好生活服务，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发挥特有的功能。

当前，国内外发展环境错综复杂，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有所上升。应对风险挑战，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做强实体经济，加快产融结合。与此同时，为资本设置行为边界和“红绿灯”，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让资本的行为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宏伟目标，把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根本要求。

（作者：林光彬，系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北京财经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 做好新时代育人工作

何秀超

《光明日报》（2022 年 05 月 13 日 11 版）

2022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育人体系，培养一流人才方阵，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担负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职责使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人才支撑。

把握培养方向，坚定育人初心

引领学生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追梦者。青年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摧的前进动力。大学是学生立志定向的最好时期。要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筑牢理想信念之基，树牢正确价值观，涵养学生家国情怀、人类情怀，引导他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立志于用所学、所长服务国家、民族和人民，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积极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立志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与新时代同向同行，用实际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新时代青年宣言。

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筑梦者。梦想要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真干实干中实现，新时代也对青年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帮助学生树立“不学习、无以立”的意识，帮助他们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奠定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让学生在校园学到真学问、掌握真本领。同时也要培养学生博学广览的习惯，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拓宽学生的人生格局和视野眼界，提升学生洞察社会、驾驭全局、躬身实践的能力，帮助学生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中接稳接好历史的接力棒。

帮助学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者。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

会上寄语青年：“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毫不畏惧面对一切艰难险阻，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在攻坚克难中创造业绩，用青春和汗水创造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作为社会上最富活力、最具创造性的群体，青年学生更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者和生力军。要着力培育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学生创造活力，为他们在新时代的风浪中开拓前进，在新时代的天地中施展拳脚奠定坚实基础。

遵循培养规律，坚定育人重心

坚持“全社会”育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学生在校期间，校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始终伴随着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都可以成为“育人元素”；学校校史校情的挖掘以及校园文化氛围的塑造，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情趣培养和性格陶冶；校园全体教职员工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对学生的行为产生示范效应，特别是服务学生的“一线窗口”以及学生的身边人，都要强化育人人人有责、人人履责的意识观念，努力成为“育人者”“引路人”。

坚持“全过程”育人。将立德树人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学生成长成才全过程，实现育人无时不在、无时不有。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就是要把育人与育才紧密结合、灵活穿插，实现寓教于乐、寓教于学。要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形成协同效应，真正实现思想与学识同步提升。贯穿学生成长成才全过程就是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学生不同成长阶段的特点和规律，因时而教、因人而教，让学生在每个成长阶段、不同的成长环境都能得到适时适当的教育。

坚持“全方位”育人。实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实现学生全面发展，需要各个部门、各门课程、各个环节协同发力、同频共振，坚持立德与立智相互融合，体育、美育和劳育相互贯通，切实践行五育并举。要真正做到以实现全方位育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敢于打破不同课程之间、不同专业之间甚至不同院校之间的传统壁垒，突破既有思维逻辑，创新方式方法，从不同层次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培育学生、从不同方面历练学生，真正实现对学生的全方位培养。

坚持培养目标，坚定育人中心

抓住育人的大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育人不是简单的“流水线”作业，要及时了解新时代大学生的特点，明白学生所思、所想、所求，不能“一本教案走天下”，要摒弃“千人一面”的教育模式。一方面，在现在的教育模式和体系下，师生之间的接触更加多样化，除了课堂授课，更有座谈研讨以及社会服务、社会实践等线上线下、多种多样的教育模式，要在充分利用这些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学生的自身需求，根据学生自身性格兴趣爱好以及特长灵活施策，有针对性的重点培养；另一方面，

由于学生在一定成长阶段存在知识和认知上的一些局限，要在想学生所想基础上做到想学生所未想，紧跟国家战略调整以及经济社会形势变化提前帮助学生做好学业和职业规划，不仅要给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更要为之提供有效的实现路径。

培养育人的“大先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大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教师是离学生最近、面向学生时间最长的群体，一名好的老师既要有扎实的知识功底作为基础，也要有广博的视野和宽阔的胸怀；既要做到亦师亦友，更要做良师益友；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既能够在生活中给予学生关心，也能够在学习中给予学生指导。要按照“四有”标准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引导教师热爱并坚守三尺讲台，自觉做教书育人的“大先生”。

打造育人的大环境。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要统筹好育人的“供给端”与“需求端”，既要做好管理者，也要做好服务者，避免形成学生群体和教师群体的信息孤岛。既要深入教师一线，及时调研了解教师所思所想，也要深入学生一线，及时了解学生所求所盼，同时要做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催化剂”，精准对接统筹施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紧盯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不断强化以师生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持续提升校园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为学生的成长成才和教师的教书育人打造风清气正的校园环境。

（作者：何秀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我国减税降费政策的特征及其理论内涵

马海涛 姚东旻

《光明日报》（2022 年 06 月 07 日 11 版）

现代税收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财政体制改革措施之一。与税收制度改革相适应的减税降费政策，是当前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大政策抉择。2008 年以来，我国的减税改革经历了“结构性减税”（2009 年）、“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2013 年）、“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2015 年）、“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2019 年）、“坚持阶段性措施和制度性安排相结合，减税与退税并举”（2022 年）等演变过程，其历时之长、规模之大举世罕见。2019 年实行个税改革后，前 10 个月便实现人均减税 1786 元，惠及 2.5 亿纳税人；“十三五”期间我国累计减税降费超过 7.6 万亿元，2021 年新增减税降费超 1 万亿元，仅小微企业就惠及超过 2000 万户。总体来看，我国减税降费政策在减税目标、减税对象和减税方式上体现出了独特优势。

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推行减税降费政策

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我国减税降费政策体现出两个特征：一是服务国家战略发展需要，二是充分保障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的相互协调。

首先，服务于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即通过减税降费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产业升级、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等提供支持。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政策的落实力度，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十三五”时期，我国鼓励科技创新税收政策减免金额年均增长 28.5%，累计减税 2.54 万亿元，有力降低了企业研发成本，增强了企业创新动能。通过结构性减税，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推动设备更新和新技术利用，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实施短期“逆周期调节”的同时，亦兼顾了“跨周期调节”的需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实施阶段性税收缓缴，为跨周期调节储备了政策空间。比如，2021 年末国务院决定对第四季度部分制造业企业实行部分税种的阶段性税收缓缴。这种跨期调剂的措施，保障了市场运行，为 2022 年的减税降费预留了空间。二是我国在实施减税降费的同时，通过不断完善财税

制度及其长效机制，为跨周期调节确保了必要的财力。例如，我国推行“营改增”后，在2016年迅速制定了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五五分享”的过渡方案，并在2019年规定维持“五五分享”。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地方政府财力，确保地方政府有适当财力实施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

坚持“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相结合，确保减税降费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并推动共同富裕

我国减税降费政策强调在分配环节“分好蛋糕”，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促进社会公平。通过个人所得税改革，提高免征额并逐步新增涉及基本民生支出的扣除项，为低收入群体减轻税负压力并缩小收入差距。这些减税措施通过提高“累进”程度和保障基本生活，推动实现“调高、扩中、提低”的目标，使分配结构进一步优化。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提高免征额和增加专项抵扣考虑了其生活负担，有助于促进低收入者向上流动。对于中等收入群体，对综合所得课税的改革有利于提高纳税人的实际收入水平，降低工薪阶层的实际税负，促进税收公平性，进而为“扩中”奠定基础。

除了“分好蛋糕”，我国的减税降费政策也为“做大蛋糕”提供了支持。减税降费政策的重点对象是小微企业。一直以来，我国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力度不断扩大，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多次扩大小微企业优惠政策的使用范围；在增值税方面，不断为小规模纳税人提供免征、减计的优惠政策。我国的减税降费政策采取了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并举的组合方式，旨在确保全部行业都能受益。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相结合”，要求“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对各类行业、企业进行“一视同仁”式的减税。这种让利于全体人民的举措，有助于促进全行业通力合作“做大蛋糕”，推动共同富裕。

强调盘活市场主体的现金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我国不断完善主体税种的立法工作，同时结合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来明确规定具体的税收要素，结合税制改革将减税降费政策更加及时、快速地落到实处。2016年后，减税降费政策紧扣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通过调低增值税率、将增值税税率由四档减至三档等来简化和优化增值税税率结构，推进增值税实质性减税。

除了调整税率以外，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留抵退税等手段的使用力度，与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协调配合，旨在进一步提升纳税人对减税降费政策的获得感。2019年开始，我国允许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均有机会申请享受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2022年，我国进一步加大留抵退税实施力度，对于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制造业等行业企业一次性退还上述企业存量留抵税额。通过制度性、结构性和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的组合发力，我国宏观税负逐步下降。实践表明，我国实行留抵退税制度，通过退给企业真金白银，直接为企业提供现金流，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通过配合“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从而保护市场主体，

激发其活力。近年来，我国大幅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对市场主体进行减负，取消、免征或降低中央级与省（区、市）级设立的多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这些措施进一步厘清了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降低了企业的费用负担，减少了行政事业收费对市场造成的扭曲，为推动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奠定了基础。2021 年，财政部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实现非税收入收缴“跨省通办”，在税费征收管理与服务方面更加科学、便捷、法治，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

持续降低市场主体税负，为优化我国中长期税制结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持续稳定的动力

我国结合税制改革推进减税降费政策，坚持了持续降低市场主体税负的改革目标导向。我国结合税制改革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营改增”改革等减税降费政策，重点围绕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展开。“营改增”改革期间累计减税降费 3 万亿元；增值税税率两次下调，其减税规模分别达到 1.3 万亿元、2.36 万亿元。目前，我国市场主体的总量超过了 1.5 亿户，其中 2021 年新增涉税市场主体 1326 万户，同比增长 15.9%。优化增值税税制改革是我国中长期税制结构优化的主线之一，对于构建现代税制体系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我国坚持结构性减税方向，逐步建立起以普惠性财税政策为主的政策支持方式，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稳定的支持。近年来我国已累计出台六次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通过加大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政策实施力度，推动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数据表明，2021 年我国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新增减税 2951 亿元，企业提前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减免税额 3333 亿元。长期来看，鼓励创新的减税降费政策能够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增添持续动力。相比于 OECD 国家，我国是唯一一个在十多年来持续降低增值税率的国家。自 2008 年金融危机后，OECD 国家增值税标准税率一直呈上升趋势，2008 年仅有 4 个国家的增值税标准税率超过 22%，截至 2020 年有 10 个国家的增值税标准税率超过 22%。总体而言，西方国家通常实行供给学派的短期经济策略，制定具有一定时限的“一揽子减税计划”。而我国减税降费政策是支持积极财政政策提升效能的重要手段，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效应会持续增强。

综上所述，我国的减税降费政策，同时具有短期“逆周期调节”和长期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双重目标，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持。在减税对象方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减税降费政策关注了低收入人群、小微企业等重点群体，同时确保了全行业都能获益，激发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在减税方式方面，我国减税降费政策在制定程序、实施手段等方面均突出了灵活性，并且一以贯之坚持实行长期性减税，稳定了市场主体预期和宏观经济发展。未来，我国的减税降费还将持续发挥上述特色优势，为积极财政政策提升效能，为更好地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长期繁荣稳定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作者：马海涛、姚东旻，分别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财政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见多识深，把大思政课讲深讲透讲活

冯秀军

《光明日报》（2022年06月21日15版）

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提出了“‘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中来讲”的重要命题；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思政课的实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把这两次关于思政课的重要讲话联系起来，可以发现，这里提出了思政课教学应着力解决的两个大问题：一是“视野窄”，二是“视力弱”。“视野窄”，需要打开大视野，解决“见多”的问题；“视力”弱，需要把道理讲透，解决“识深”的问题。两者结合起来，为我们提出了如何善用大思政课，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的重要课题。

善用大思政课，打开思政课的大视野

长期以来，理论与实践“两张皮”，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脱节，是影响思政课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痼疾。理论与实践脱节，首先带来思政课“视野窄”的问题：理论讲解缺乏现实针对性，不关注、不了解社会生活，不能及时把生动鲜活的实践引入教学，从理论到理论，干巴巴地讲，教学毫无生命力。提出“大思政课”的命题和要求，既是对“两个大局”叠加疫情给社会生活、学生思想带来广泛、深刻影响的敏锐洞察和积极呼应，也为新时代思政课打开视野、走进社会大天地、与时代同频共振指明了方向。

大思政课的核心任务，就是要为学生打开一扇门，搭建一座桥，让学生走出孤芳自赏、自我封闭的小天地，走向一个广阔的大天地、新世界。这个大天地里，有祖国、有人民；有历史、有未来；有中国、有世界，有责任、有奋斗。打开这扇门，学生才能发现天地高远，世界辽阔，人生厚重，奋斗值得。如何把“桥”的两端连接起来，帮助学生搭建起这样一座深刻理解并自觉肩负使命和责任的思想之桥？其要旨在于帮助学生认识时代、认识社会。唯有认识时代和社会，认识个体与时代和社会的命运关联，才能使每一个个体深刻认识自己的时代使命、自觉担当起

自己的社会责任。抢险救灾的最前线、疫情防控的第一线、脱贫攻坚的战场上、科技攻关的岗位上、奥运竞技的赛场上、保卫祖国的哨位上，处处皆是思政课的新天地、新素材。思政课必须走出教室和校园，带领学生走进社会和实践，把丰富的实践、鲜活的人物、生动的故事引进课堂，把家事、国事、天下事引入课堂，把风声、雨声、民心声传入课堂，在视野开阔的大思政课堂中培养学生事事关心、声声入耳的家国情怀、使命担当。

善用问题，把大思政课讲深讲透

所谓思政课教学“视力弱”，是指教学对社会生活的认知停留在经验常识层面，就现象谈现象，缺乏对现实的理论解释力和对学生的思想引领力。而善以问题为导向，用精准的问题击中学生思想困惑，用透彻的问题解读社会生活表象，是讲深讲透大思政课的关键。

教学中坚持问题导向，首先要看问题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抓住了学生关切、困惑的问题。我们要调查研究学生关注的、有疑惑的问题，并将这些问题归纳归类。学生关注的具体问题可能多种多样，但深入分析这些问题，很多又具有同质性和相通性。将问题归类，实质上是一个进一步提炼深化，寻找深层次、根本性、复杂性问题的过程。这些经过归类的问题，正是引导教学走向深入的“引路石”。坚持问题导向，还要找准思政课教材中的重难点问题。教材是教学的基本遵循。教材中的基本原理和核心观点，都是对有关理论问题的回答。这些教材中的理论问题，则是来自于实践中的现实问题，是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抽象和表达。因此，找准教材中的重点难点，就是要透过结论找到问题，并以此问题为起点来引导教学、答疑解惑。

思政课不但要求教师讲深讲透，还要培养学生面对纷繁社会现象看深看透的能力。这要求思政课教师不但能给学生打开一扇门、搭建一座桥，还要为学生提供一套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现实的“思想工具包”，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套“工具包”，是学生看世界、闯天下的导航仪，是学生面对纷繁复杂社会现象“以无厚入有间”的解剖刀，也是学生健康成长成才、成就出彩人生的护身符。只有拥有了这个“工具包”，才能帮助学生学会从天下大事中认识天下大势，从天下大势中坚定理想信念。

善用故事，把大思政课讲实讲活

思政課的本质是讲道理，但把道理讲清楚、讲透彻，特别是讲到学生心里并不容易。这就要求思政课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既能讲深，还能讲活，最终能讲透。讲故事，就是把抽象、高深、枯燥的道理变得形象、生动、鲜活的好办法。

用故事讲道理，首先要选好故事。故事选择要兼顾三个方面：一是深刻性，要有丰富深刻的理论内涵和思想内涵；二是生动性，要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三是典型性，要有突出的独特性和代表性。其次，要善于讲述故事。讲故事的实质，就是将理论植根于具体的情境之中，把在理论提炼过程中抽象掉的具体细节再次还原。通过理论的还原和情境化，故事实现了理论高度

与生活温度的融通，让抽象的理论在故事中变得真实、鲜活起来。生动感人的故事，可为学生们营造一个沉浸其中的课堂，从而把理论的抽象化为触及学生心灵的感动。

善用大思政课，讲好生动实践故事，但不能把思政课讲成故事会。其中的关键在于，既要讲好故事，更要评好故事。如果说讲好故事是“画好龙”，评好故事就是“点好睛”。用故事讲道理，评好故事这个“点睛”的环节尤其不能缺。许多思政课教师注重讲故事，也善于讲故事，但学生依然不满足、不解渴，问题就出在缺少或是未能把握住“评好故事”这个关键环节。从理论到故事，是理论的还原；从讲故事到评故事，则是实践到理论的升华。缺少了对故事思想性、理论性的升华，思政课就会沦为简单堆砌的故事会。因此，能否评好故事，既彰显了思政课教师理论联系实际、实践升华为理论的专业功底，也决定了能否用故事把道理讲实讲活、讲深讲透，达到理想的教学成效。

（作者：冯秀军，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有效缓解预期转弱压力

王立勇

《光明日报》（2022年07月05日11版）

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并提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202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把三重压力列为当前需要应对的主要问题和挑战。“三重压力”是中央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客观、理性、精准判断。化解三重压力，需抓住“预期转弱”压力这一着力点，加强预期管理，提振信心和热情，为“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等压力的解决创造条件、腾挪空间、提供推力。

一

预期的形成是一个学习过程，是在信息粘性和信息不对称下，市场主体接受外部信息不断调整先验判断的过程，也是自我实现的正反馈过程。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往往是以预期为基础。基于自身形成的预期，微观主体会做出投资或消费决策，进而会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微观主体预期是重要的经济力量，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预期变动是经济波动的重要驱动力。宏观经济政策所能够产生的实际效果依赖或取决于微观行为，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可能会因为预期的变化而完全改变。以通胀预期为例，通胀预期在经济主体的生产、消费、储蓄及投资等经济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能够影响个体消费、储蓄和借贷决策，以及工人的工资议定决策和管理者的定价决策，会影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从而能够影响消费和经济增长。预期管理是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

近年来国际国内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从供需两侧对我国经济造成冲击，由此产生的预期转弱主要表现在：第一，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增多，导致微观主体预期不稳、信心不足，创新创业积极性有所降低，有效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低迷并存；部分市场主体过于追求短期利益，决策短视化现象严重，引发非理性市场行为。第二，微观主体预期并非总是理性和前瞻性的，

兼具后顾性和适应性，在一系列不利冲击下，信息的不完备性和主体心理活动的随意性和有限理性极易造成预期的无序化状态，出现预期扭曲、预期混乱和预期偏误。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的增加加剧了这一扭曲及偏误程度。第三，不同微观主体预期之间出现预期交织、信息交互现象及羊群效应，家庭预期转弱和企业预期转弱相互传染、相互影响，容易造成“预期转弱——经济下行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预期转弱”的恶性循环。从数据看，预期转弱表现在：居民的收入信心指数、收入感受指数、就业感受指数、就业预期指数和企业家宏观经济热度指数呈持续下行态势；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自2021年3月以来一直处于下滑态势，2022年3月分别降至49.5%和48.4%，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同样如此。

预期转弱既是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的衍生，又是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的推动力量，存在“预期转弱——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经济下行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预期转弱——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的内在逻辑。相对而言，因为与主体心理活动有关，且存在预期扭曲、预期混乱和预期偏误，以及预期交织和信息交互现象，“预期转弱”是三重压力中的难点，也是提振经济、缓解三重压力的关键点和突破点。

三

为了稳定市场信心，防止非理性社会心态的出现，党中央国务院近年来高度重视预期管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为我国宏观调控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提供了抓手，对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根据中央历次重要会议精神，下一步解决预期转弱压力的着力点主要在于以下方面：

从预期转弱的直接原因看，解决预期转弱压力的最根本途径是多措并举稳增长、促发展。我国潜在经济增长仍有较大空间，发展仍是硬道理，财政政策应积极有为，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做好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引导和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协调发挥好两个政策的预期传导机制。

落实落细留抵退税减税等组合式纾困政策，让政策速享尽享。加快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降成本、扩内需，设计能够更加有效引导预期的减税降费方案，推行更具冲击力、透明度和确定性的“稳预期”减税降费政策，提高微观主体的心理感知度，有效引导、稳定短期预期和长期预期，提振微观主体信心。

加强政策波动性和不确定性管理，降低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将微观主体预期引导纳入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完善政策调控目标体系，厘清目标逻辑，以中长期目标为主，兼顾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内部目标和外部目标；科学设定规则，实现规则与相机抉择间的协同；构建符合国情的制度约束。

做好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将宏观调控由“短期视角”和“速度视角”拓展到“中长期视角”和“质量视角”。做好政策目标、政策空间和政策风险的跨周期审视；做好与逆周期调节的搭配协调；做好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协调；做好不同宏观政策内部及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

做好政策绩效的跨周期评价，构建政策跨周期调节效果的评价和监测体系。

实施直接管理预期的非常规财政政策，丰富政策工具箱，通过提前释放财政信息和实施暂时性财税政策，非常规财政政策能够在几乎不增加财政负担的前提下有效管理预期、刺激总需求和促进经济增长，天然有效缓解“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压力的工具。在债务风险较高、财政扩张和减税降费空间有限等背景下，其尤为有效。

重视专家型主体预期，更重视非专家型主体预期。当前预期具有后顾性、适应性和顺周期性，应充实和调整政策工具箱，改善前瞻性指引的效果，使微观主体清晰理解政策目标体系和机制化运用路径，以及政策定位及协同框架；实现政策的一致性，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提升预期管理的有效性。

重视宏观经济政策的双向跨国外溢效应、传导效应和关联效应，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构建政策沟通及协调机制，提升宏观政策信息的透明度，提高政策的同步性和协调度；建立健全针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实施全口径、高频率的跨境资本规模监测，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累积演化所带来的影响。

（作者：王立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

加强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推动全球数字治理变革

李涛 徐翔

《光明日报》（2022 年 09 月 06 日 11 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要密切观察、主动作为，主动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开展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及时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数字经济事关我国发展大局，围绕数字经济积极开展双多边国际合作，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数字合作格局的重要举措。通过与数字伙伴安全互通和合作开发数据资源，加强数字技术合作，参与数字技术国际标准制定，推动数字贸易领域扩大开放，有助于在国际上及时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

数据互通合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要素基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探索建立健全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在进入 21 世纪后呈现出爆发增长、海量集聚的趋势，成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事关各国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

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数据要素更容易进行跨境流动，数据要素的价值会随着流动不断增加。在数据跨境流动过程中，国家安全、企业利益与个人隐私都面临诸多风险，数据权属问题成为一个绕不过、避不开、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近年来，由数据跨境流动引起的国际争端有增加趋势。2020 年 7 月 16 日，欧洲法院推翻了欧盟与美国 2016 年达成的“隐私盾”数据传输协议，要求全球企业必须停止在美国的服务器上存储欧盟居民的信息。2021 年 12 月 16 日，法国国家信息自由委员会要求美国 Clearview AI 公司停止收集和来自法国的数据。类似的数据跨境流动争端层出不穷，数据流通协议与共同开发机制的缺失导致数据要素的巨大价值难以被充分释放。与此同时，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在数据流动与隐私保护领域的相关立法与制度设计主要侧重于国内数据安全。我国如果不能尽快建立数据跨境流动的相关制度，将可能被

边缘化为“数据孤岛”，失去数据要素资源流通与开发领域的主动权。

积极参与数据要素的国际互通合作，一是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据跨境流动政策制度体系。统筹好国内数据治理与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流动自由化与存储本地化、数据流动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数据安全与流动技术上积极与国际接轨。二是与同我国一样坚持“数据安全、自由流动”基础原则的国家尽快建立数字伙伴关系，积极开展双多边数据互通合作，共同开发数据要素资源。三是结合我国发展经验积极参与国际数据安全规则制定。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就跨境数据流动的基础性规则达成共识，各国的立法模式和数据标准之间存在严重分歧。2020年9月我国发起《全球数据安全倡议》，表达了对于数据安全与合作的基本主张。未来应以此倡议为基础，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数据流通议题讨论，呼吁国际社会加强数据互联互通，弥合数据流通分歧。

技术创新合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内在动力

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的实现基础和动力来源。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是数据要素得以充分使用的前提条件，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赋能。伴随各国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数字保护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在一些主要发达国家出现抬头趋势。这些国家强行从战略、安全和国家间竞争的角度看待科技议题，过度保护本国科技市场、技术资源和比较优势，阻碍知识传播与创新合作，形成技术垄断与数字壁垒。

数字技术代表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先进生产力，围绕数字技术展开的国际合作有利于数据要素的高效配置、各类市场主体的加速融合以及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应通过积极参与数字技术创新合作，推动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首先，与其他国家的数字技术合作应以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和搭建技术创新平台为重要抓手。近年来，我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了跨境光缆等基础建设合作，保障网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而推动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我国还应积极参与搭建数字技术国际创新合作平台，强化资源优势互补，维护全球协同一致的创新体系，进而促进不同制度、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在网络空间包容性发展。其次，参与制定国际技术标准不仅是主权国家的责任所在，也是保障国际标准多样性和公平性的重要举措，在数字技术的国际标准制定上，我国政府、企业与研究机构应担当更加积极的角色。国际技术标准对于相关技术与行业的发展具有引领作用，主动参与数字技术标准的制定是我国持续增强数字经济全球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布局。在国际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国内科技企业与研究机构应担当更加积极的角色。

产业发展合作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互利共赢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两大核心业态，也是我国加强数字经济国际合

作的重要内容。在数字产业化方面，我国目前面临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供应链受制于人的现实困难；在产业数字化方面，面临大量工业企业技术能力有限、基础配套能力不足与研发人才资源匮乏等问题。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产业发展合作是解决这些困难的有效手段。

大力发展数字贸易，推进高质量对外开放。数字贸易是各国在数字产业发展上展开合作的重要抓手，也是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应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探索放宽数字经济新业态准入。加快建设数字口岸、国际信息产业和数字贸易港，构建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国际化数据信息专用通道和基于区块链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支撑平台。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扎实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积极鼓励各业务环节探索创新，培育壮大一批跨境电商龙头企业、海外仓领军企业和优秀产业园区，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和生态圈。

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建设。通过主导和参与数字经济领域双多边合作协议推动电子商务便利化、数据转移自由化与个人信息安全化，有效弥合数字鸿沟，积极开展数字能力建设和政策实践分享，明确数字经济的合作方向和重点领域，为推动数字经济合作做出重要制度性安排。通过与各国更深层次的产业发展合作，寻求更多利益契合点、合作增长点、共赢新亮点，推动彼此互补共进、协同发展。

加强数字经济治理合作，推动构建全球治理新秩序

目前全球范围内尚不具备统一规范的数字经济治理框架，各国在数字经济治理上缺少足够共识，相关规则孤立且零散，无法形成有效治理模式与完整治理体系。原有全球治理体系无法充分应对时代新挑战，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面临政治考量、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等多方面的重大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球数字经济是开放和紧密相连的整体，合作共赢是唯一正道，封闭排他、对立分裂只会走进死胡同”。我国应积极开展双多边的数字治理合作，推动建立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营商环境，破解当前的全球数字治理赤字。

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的谈判与体制建设。目前，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在内的各大国际组织均在开展数字经济治理相关工作，以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提升全球治理能力、促进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消除数字鸿沟和数字壁垒为主要目标。中国应积极参与相关议题的讨论与治理体制的建设工作，并基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实践建言献策，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群体的正当权益。

进一步完善和维护以区域性机制为主的双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深化政府间数字经济政策交流对话。我国应积极主动向世界提供数字治理公共产品，有效弥补现有国际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存在的缺陷，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促进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开创国际数字经济合作新局面。

面向未来，我国应加快构建数字合作新格局，推动数字经济不断迈向新台阶，让更多国家和人民搭乘信息时代的快车，共享数字技术发展成果。通过积极倡导“数字多边主义”，推动双多边数据跨境流动和数字合作协定谈判，参与制订数字技术和网络安全的国际标准，我国将

不断提升全球数字规则框架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与各国合作伙伴共同推动形成一个繁荣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开启人类数字文明新时代的征程中，中国应发挥更加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坚定践行“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努力扩大利益汇合点、画出最大同心圆”的全球治理观，激发数字经济合作的潜能和活力，造福全世界人民。

（作者：李涛 徐翔，分别系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副教授，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扎实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何秀超

《光明日报》（2022年12月08日06版）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人才培养工作，进入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对学校思政工作也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高度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内容 and 形式。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召开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全国教育大会、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等系列重要会议，高度重视学生思政教育并越来越注重其整体推进。思政教育关系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渐进式、发展性特点，需要持续用力，需要大中小学统筹协调推进。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既是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人才培养工作的思想基础，更是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保证。

加强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践一再证明，只有牢牢掌握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权，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才能确保学校正确的政治方向，确保学校用科学理论培养人、用正确思想引导人，培养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应进一步明确大中小学各级党组织的主体责任，加强对思政工作的统领，科学谋划好学校思政教育有关工作。党组织要切实负起责任，把思政工作当成主责主业来抓，牢固树立抓思政工作是本职、不抓是失职、抓不好是渎职的意识，切实推动思政工作取得实效。学校领导要带头走进课堂，带头推动思政工作，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

注重学习提升。把思政教育做活、做好，不断提升思政教育参与者的思想、理念、水平与能力是关键。一是注重学习的深化。学深学透是前提、是基础。通过开展融入式、嵌入式和渗透式的学习，提升学习效果。在学习中，要着力解决理论学习浅尝辄止、内容空泛、呆板生涩、不生动不解渴的问题，杜绝流于口号表态、做官样文章的问题，解决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脱离实际、照搬照念不接地气的问题。二是注重内容的消化。消化吸收是重点、是关键。

不消化吸收，就无法转化为思想上和行动上的自觉。要通过学习，把新理论、新思想内化为自身的思想养分，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引，改造主观世界，提升精神境界。三是注重实践的转化。推动工作是目的、是根本。理论只有结合实际，解决实际问题才会有生命力。要把学习的成果转化为立德树人和提高学校思政工作效果的实招。

打造有力队伍。大中小学广大教职员工作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辛勤园丁、灵魂工程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思政教育也是如此，思政教育是否成功，能否取得实效，有没有一支得力的工作队伍是关键。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种素养”的标准和要求，按照“四个相统一”“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的要求，落实政治学习、培训轮训、实践锻炼等工作制度，着力提升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完善选拔、培养、激励机制，形成一支专职为主、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工作力量，推动思政工作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引导思政工作队伍深入学生，与学生交朋友，了解学生的兴趣点，熟悉学生的话语体系，让学生听得进、信得过、靠得住；加强典型培育和宣传推广，积极搭建平台，倾斜资源，让有想法、有能力、学生喜欢、工作效果好的老师突显出来，提升学校思政工作的示范效应和影响力。

一体化推进。学生成长有其规律，只有充分了解学生的成长发展规律，才能有的放矢开展思政工作，才能把党和国家对人才的要求，特别是对人才的思想道德要求点滴浸润到学生心中。明确这个前提，是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前提，也是直接关系到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能否达到预期育人目标的实践要求。要以注重、适应和促进学生全面成长发展为落脚点，一体化、持续推进思政教育。做好大中小学思政教育的衔接，从理念、人员、教材等重要领域出发，持续用力。

理顺工作机制。要在不同学科间构建横向“大思政”体系，发挥学校思政教育的整体合力，避免思政教育“碎片化”问题。具体到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工作中，要深化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改革，把思政工作体系贯通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形成一体化育人格局。充分发挥思政课主渠道作用，通过思政课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通过生动、深入、具体的纵横比较，在思政课上把一些道理讲明白、讲清楚；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深入挖掘其他专业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各类课程与思政课有效对接，做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打造全课程育人体系，形成课程育人的协同效应，切实解决部分教师只教书不育人，不愿做、不会做学生工作的问题。

重视监测评价。要把以往的“软指标”变成“硬约束”，杜绝思政教育只传达不研究、只学习不落实、只表态不行动，停留在口头上、会议上、表面文章上的情况。在这方面，一是明责要细。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对照中央和教育部的要求，一件一件梳理，一项一项细化，制定责任清单，将责任压给学校、划分到人。二是压责要实。使责任环环相扣、压力层层传导；把责任压到领导头上，充分发挥领导班子“关键少数”的作用；把责任压到每个人肩上，做到事事有人负责、人人都在负责。三是问责要严。通过严肃问责来解决“敷衍塞责”

的问题，倒逼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确保各项任务铆实盯紧，不跑偏，不走样。

做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意义重大，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和韧劲，把大中小学思政工作做得更有针对性、更有实效性，努力做出特色，办成精品，形成品牌，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教育战线贡献。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健全现代预算制度 持续提升政府治理效能

马海涛 肖鹏

《光明日报》（2023 年 01 月 17 日 11 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税体制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党的十八大以来，预算制度改革作为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率先启动、率先突破，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推进预决算公开、实施中期财政规划、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建立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等方面，密集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就“健全现代预算制度”作出具体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多方同步发力进一步健全我国的现代预算制度，牵引带动政府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重要意义

财政是国家治理之基，预算是财政管理之柱。预算体现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反映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启动的一系列预算制度改革效果明显，已初步搭建起现代预算制度的主体框架，但在财政资源统筹、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强化预算约束、预算协同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健全现代预算制度。

进一步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有助于大幅度增强财政政策的执行力。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加强系统集成，提升对财政数据的管理能力，有利于大幅度提高财政政策执行力。政府预算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基础信息管理、项目库管理、预算编制、预算批复、预算调整和调剂、预算执行、会计核算、决算和报告管理等环节，还涉及预算管理主体流程与资产管理、债务管理、绩效管理等业务的衔接问题。以系统化思维对现有的预算管理手段和信息化水平进行全面彻底升级，把基础工作做扎实，以财政管理效能提升来促进实现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目标，能够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

进一步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有助于大幅度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统一各主体的预算管理流程和规则，有利于推动财政资金使用不断提质增效。财政与各部门、单

位间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带来预算碎片化以及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的问题。财政与各部门、单位都依据各自的管理需求和规则产生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是实现有效财政监督控制的基础，也是政府决策的基础。加强政府预算、部门预算、单位预算相衔接，保证政府预算安排给本部门的资金落实到具体单位和项目，建立自上而下的支出控制措施，实现政府预算对部门和单位预算的支出限额控制，防范财政风险，能够促使财政资源从低效益领域转向高效益领域，激励各部门和单位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进一步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有助于大幅度优化财政管理流程，提升财政管理效率。通过统一预算管理流程和规则，设置统一的预算管理要素，能够破解预算管理控制要素的含义、适用范围、分类标准、控制口径不一致进而导致传递或理解出现偏差的问题。预算管理是公共资源获取和使用的过程，需要接受监督。为更好接受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审计监督，进一步发挥财会监督利剑作用，满足实时监督和控制需要，预算管理在事前就需细化数据记录规则，从生产系统完整准确提取数据，防止部门、单位因仅靠事后填报和汇总预算信息而出现人为干预和信息冗余影响控制效果的局面。不断丰富预算公开内容，提高预算公开的及时性，满足人民群众对财政透明度和政府履职尽责情况日益增长的关注，将外部监督压力转化为内部改进管理的动力，促进财政、部门和单位不断改进预算管理。

进一步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有助于大幅度提升财政数据分析能力。健全现代预算制度，打造完整可靠、服务决策的财政数据分析体系，有利于更好地服务政府的宏观决策。这就要求预算执行数据必须完整、准确并相关，财政国库自动记录支出明细、合同协议、电子发票、现金预测等信息，自动生成财务报告和分类信息查询表，为预算执行管理、绩效评价、财政监督和综合财务报告提供可靠支撑。实现各级财政总账数据标准统一，逐步实现全国财政总账数据自动汇总，建立全国预算执行数据的集中管理和大数据分析机制。进一步挖掘数据背后的决策价值。加强决算数据、非税收入数据、动态监控数据、差旅电子凭证数据等财政国库数据的分析应用，为改进财政财务管理、服务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必须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

当前我国的预算制度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攻坚期，过去出台单项制度和规则的方式，已无法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改革要求。健全现代预算制度必须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从“强化统筹”入手进一步提高财力统筹能力，从“突出绩效”入手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能力，从“支出标准”入手进一步强化预算法定约束，从“信息支撑”入手进一步提高协同管理能力，多方同步发力，力争以“小切口”推动“大变革”，牵引带动政府治理效能持续提升。

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增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强化全口径预算统筹调配。加强“四本预算”和政府专项债券等收入来源的衔接，健全政府投融资机制。完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对土地、海域、矿产等有形资源和指标、规模、权益等无形资产实行市场交易、有偿使用、统一监管。建立“集中财力办大事”预算决策机制，以事业发展规划为遵循，实行“决策（规划）—

业务—资金—项目”清单式管理，加大对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战略决策、政策的财力保障，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提升财政资源配置能力，确保财政资金使用提质增效。明晰绩效管理权责。推进预算管理和绩效管理深度融合，保障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强化全流程预算绩效融合。全面实施重大政策和项目事前绩效评审，加强成本效益分析，从源头实行绩效“一票否决”预算控制。实行预算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全面实行预算支出“项目化”管理，以零基、滚动、优选为导向进行项目排序，实现各项支出可增可减、可进可退。

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强化预算法定约束。推进财政支出标准化建设。加强基本支出标准体系建设，一方面，要健全基本支出标准体系框架，科学设置定额项目，合理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和基本履职需要；另一方面，要分类明确财政保障政策，完善支出标准和保障政策调整机制。加强项目支出标准体系建设，一方面，要从项目文本和支出标准两方面推进标准化工作，进一步统一项目文本的框架结构、支出内容、文本格式等内容，针对项目各项支出内容中适合制定标准的部分，制定符合实际的支出标准；另一方面，将财政资金分配规范及方法等纳入支出标准范畴，把握建设重点，对于涉及面广、资金量大、实施期限长、适合标准化管理的项目，应进一步加快标准体系建设的进程。

推动数据共享，提高预算管理信息化水平。实现预算管理信息贯通共享。加强大数据开发应用，强化财政部门数据密集型综合管理部门的定位，推进财政与税务、人民银行等的跨部门数据连通，夯实预算管理基础。在纵向上进一步促进中央和地方财政系统的信息贯通，在横向上进一步促进部门间预算信息的互联共享，运用信息化技术建立全覆盖、全链条的财政资金监控机制，实时记录和动态监控资金在下级财政、用款单位的分配、拨付、使用情况，形成多层次的综合监督体系。

强化协同监督，提升预算审查监督能力。发挥多种监督方式的协同效应。加强预算和各项政策的衔接，编制年度预算时，将全面贯彻国家重大战略、政策作为预算安排的首要任务，支出预算和政策必须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反复对标对表。改进和细化预决算编报，逐步完善预决算草案的编制，以便于人大代表理解和监督。加强与人大代表的日常沟通汇报，积极配合人大审议预决算，将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预决算的决议作为制定支出政策、分配财政资金、完善管理措施的重要依据。

（作者：马海涛、肖鹏，分别系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ZDA043）阶段性成果）

数字经济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

李涛 欧阳日辉

《光明日报》（2023 年 02 月 22 日 06 版）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要求“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在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进程中，把握数字经济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势至关重要。数字经济的发展始于数字技术的发明创新，技术进步推动了数据要素的普及应用，数据要素的全面深入普及应用带来了要素市场的成长成熟，随着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与数字经济相关的一系列制度体系不断建立健全，促进并最终实现了数字经济与数字社会的高度融合。

1. 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

数字经济源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應用。在早期的技术化阶段，数字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数字技术。随着计算机的发明和普及，信息化经历了两个高速发展的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个人计算机的大规模普及应用，人类迎来以单机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大规模数字化；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互联网的大规模商用，以联网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网络化带来第二次数字化浪潮。

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得益于计算机和互联网这两项关键技术。这两项技术的发展和應用对经济社会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一是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处理技术的出现、算力的发展和應用，方便了数据的收集、存储、加工和处理；二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互联网技术的兴起深刻影响了人类生产生活，促进了数据的海量生产、交换和流动，移动互联网快速普及，推动全球数据爆发增长、海量集聚；三是近年来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复合应用，产生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数字技术逐渐成为通用技术，为数据要素化转化和應用提供了高效可靠的技术支撑。比如，基于大数据采集、存储、处理和呈

现等技术，实现了海量数据的实时与近实时处理。

数据成为生产要素进入经济系统也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信息通信技术推动了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即时通信等新模式的发展。数字技术被实体产业广泛应用，技术从助力社会经济发展的辅助工具向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转变。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数据逐步融入实体经济，促进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进而催生出一种新的经济范式——数字经济。依托数字技术，长期积累和储备的数据资源得以转化和应用，从而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

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数据的采集、存储、加工、流通、分析与应用快速发展。例如，区块链技术推动数据要素实现跨部门安全共享，隐私保护计算技术在充分保护数据和隐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使用可控可计量”，大数据技术极大地扩展了数据分析处理的应用空间。数字技术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和企业能够接触和使用大数据。当数字技术融入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成为基本的管理工具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从管理者主导的经验型决策转向高度依赖数据分析结果的科学决策模式，即“数据驱动型决策”。

在数据要素化阶段，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共同驱动数字经济发展，数据要素成为关键生产要素。随着数字平台的发展，数据可以自动化、模式化、持续不断地实时在线获取，实现数据流动自动化，而且数据复制和传递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数据规模越大、种类越丰富，产生的信息和知识就越多，呈现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数据要素不仅推动传统生产要素革命性聚变与裂变进而产生倍增效应，而且提高了传统要素的配置效率，驱动经济加快创新发展。因此，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数据要素具备了关键生产要素的典型特征，最终，数据要素成为数字经济繁荣的核心引擎。

随着我国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及大数据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属性不断凸显。数据要素作为核心引擎推动数字经济深化发展，是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必然选择。

3. 实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机制

数据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必须依赖市场机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市场主体能够探索更灵活的数据交易模式，提升数据交易流通的效率。不断完善相关市场机制，有助于发挥数据要素的叠加倍增效应、激发数据要素的价值潜力。

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经过了两个阶段。2014 年—2020 年，我国大数据交易处于起步阶段。在此期间，数据交易主要以单纯的原始数据“粗加工”交易为主，数据成交率和成交额不高，难以满足社会的有效需求。数据交易过程中缺乏全国统一的规范体系，无法有效破解数据定价、

数据确权等难题。2020 年 4 月，中央明确将数据列为生产要素，部署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标志着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进入全面突破阶段。之后，一方面国家和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相关的政策文件，致力于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厘清数据要素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平衡数据有序流动与数据安全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在政府牵头下，上海、深圳、北京、湖南等多地加快布局数据交易所，聚焦解决确权难、定价难、互信难、入场难、监管难等共性问题。

实现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必须建立多层次数据要素市场，既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多层次数据要素市场建设；重组原有的数据交易所，吸收大型互联网公司、大型 IT 厂商、垂直数据服务商、金融机构等主体参与，建设区域性数据市场；形成全国性市场与区域性市场、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综合市场与专业市场共同发展的多层次数据要素市场体系。

4. 数据要素制度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数据要素制度体系是统筹数据要素收集、流通、交易与应用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协调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基础类制度，包括数据采集制度、数据产权制度、收益分配制度等；二是发展类制度，包括技术标准、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制度、流通交易规则、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数据综合利用规则等；三是治理类制度，包括数据伦理、数据隐私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等。

制度创新是激发市场活力、拓展创新空间的关键保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权利保护、跨境传输管理、交易流通、开放共享、安全认证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深入开展数据资源调查，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这标志着我国全面启动数据要素制度化工作。保护数据安全和隐私、平衡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成为推动数据要素应用的核心问题和要素制度化的重点。我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积极开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立法和标准制定，构筑起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安全、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安全防护网。

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是数字空间构建中融合数字技术与多元主体参与的开放多元的新型治理模式、机制和规则。当前，全球数字治理体系的构建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21 年数字经济报告》称，数据驱动的数字经济表现出极大不平衡，呼吁采取新的全球数字治理框架，以应对全球数字治理的挑战。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尚处于探索期，由于各国数字治理关注的重点不同、发展程度有别，未来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将呈现差异化、多元化、层次化、多机制共存的格局。

5. 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 2021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贺信中提到，“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

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数字文明是基于数字技术、以高科技为主要特征的文明形态，如何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共同担起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

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民，需要推进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作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建立公平、透明、开放和包容的新型世界经济秩序，共同化解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中可能面临的制度、规则、安全等多重风险。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合作共赢、和衷共济才是人类文明的最终出路，封闭排他、对立分裂只会走进死胡同。中国正在积极推进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基础上，有能力成为全球数字文明的最大推动者，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力量。

（作者：李涛，系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欧阳日辉，系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提高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王立勇 李瑞琴

《光明日报》（2023 年 03 月 17 日 11 版）

党的二十大报告及 202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提出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国内外大循环的动力和活力”。这些都为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重要遵循。“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与“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有利于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同样，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吸引和配置全球资源要素，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与水平的重要基础和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就是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同世界经济更为密切、更高质量的交流和互动，夯实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具体而言，“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扩大国际循环的范围。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强化区域间开放联动，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巩固东部沿海地区和超大特大城市的开放先导地位，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放水平，通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造国际运输和物流大通道，推动沿边开发开放高质量发展，加快边境贸易创新发展，更好发挥重点口岸和边境城市内外联通作用。

拓宽国际循环的领域。通过大幅放宽市场准入，继续合理缩减外商投资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吸引更多更优质外资，提升外资质量和水平。尤其是将稳妥推进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信息技术等金融和服务业领域开放作为对外开放重点，推动数据跨境流动和数字贸易发展，推进垄断行业向社会资本开放，打造服务贸易开放新高地。

提升国际循环的层次。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这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支撑。加快构建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相协调的国内规则和制度

体系；在国内实施一系列系统性制度创新，逐渐将其提升成为全球规则、规制、标准，从而深度融入并重塑全球经贸规则。

改善国际循环的平衡性。坚持出口与进口并重、“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这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体现。积极提升进口和出口层次、范围和质量；通过双向投资协调发展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培育竞争新优势，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战略资源要素。

提高国际循环的安全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必然要求提高国际循环安全性，统筹好开放与安全的关系，构筑与更高水平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提升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增强国际循环平台的引领力。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应统筹推进各类开放平台建设，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重点是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深化首创性、集成化、差别化改革探索。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出入境、运输等政策。

二

“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是对我国当前对外开放新形势的客观、理性、精准判断。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深度融入国际循环，已逐渐成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重要位置，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但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遇到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从内部看，生产体系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还存在不少“卡点”“堵点”问题，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产业链供应链可靠性和安全性有待加强。从外部看，世界潮流变幻莫测，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充满不确定性、不稳定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大冲击。

中国已深度融入国际循环，但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效益仍有很大拓展空间。“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对于中国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以及推动世界经济繁荣，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推进制度型开放，必然要求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对全球优质资源要素的吸引，改善资源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这些举措一方面可以促进国内产业和企业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国内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第二，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在国际

竞争和合作中取得新优势。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度融入并重塑全球经贸规则，可以进一步发挥中国在国际循环中的影响力，突出中国大规模市场的重要性，使中国在全球经贸规则和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中逐步占据主动和主导地位，从而在更多国际事务中体现出中国倡议、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第三，有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着更加多元化、包容性的方向发展。中国坚定不移全方位扩大开放，更高效地促进国内外市场联动，可以让中国市场为国际经济循环注入更多活力，促进国际社会共同发展，让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发展机遇，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第四，有助于加快形成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持久动力和引擎，推动全球经济向好发展。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已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提升，必然会进一步带动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凭借在高铁、5G 技术等方面的科技优势，中国可以更加积极地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更好地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能，推动全球经济向好发展。

（作者：王立勇、李瑞琴，分别系中央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

以财政政策为抓手支持乡村振兴

马海涛

《经济日报》（2021 年 8 月 30 日 10 版）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离不开财政政策的支撑和保障作用。站上新的起点，要继续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注重延续性和全面性，坚持多角度多层次推进，扎实做好基础性和兜底性工作，提高财政治理效能，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随着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提前 10 年实现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如何在总结脱贫攻坚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看到，脱贫攻坚目标的顺利完成，和财政政策发挥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8 年来，中央、省、市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 1.6 万亿元，其中中央财政累计投入 6601 亿元。发挥政府财政资金投入的主体和主导作用，特别是中央和各级财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是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保障。站上新的起点，要继续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合理安排财政投入规模，优化支出结构，调整支持重点，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增强基础保障功能，更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注重延续性和全面性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一篇全面振兴的大文章。以财政政策为抓手支持乡村振兴，要围绕乡村振兴的总目标和总要求发力，坚持科学协调，注重财政政策的延续性和全面性，更好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一方面，要注重延续性。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财政政策应持续加力不放松。既要保持脱贫地区的财政投入力度总体稳定，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还要有效杜绝重复建设，提高各类资源的使用效率，高质高效地推动政策目标有序实现；既要在保障巩固脱贫成果的基

基础上，针对乡村振兴的重点集中发力，加大对相对贫困的治理力度，还要对政府各种涉农财政资金进行整合，充分发挥综合效应。

另一方面，要注重全面性。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脱贫攻坚重在解决局部贫困地区的基本生存问题，而乡村振兴关注全局发展，强调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也就是通过总体性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央从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深化农村改革、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等多方面进行部署。为此，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与之相适应，财政资金的投入方式也应有所转变。

总体上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是推动农业农村与国家同步实现现代化、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发挥好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要明确目标导向，做好财政资金“存量”和“增量”的文章，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在存量方面，要充分利用好脱贫攻坚时期积累的涉农资金管理使用机制，巩固利用好使用脱贫攻坚专项资金的长周期、远期收益项目，确保存量财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实现长期效果；在增量方面，要持续提高财政投入的强度和精准度，在重点环节和重点领域方面予以财政资金的倾斜，加大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人才振兴以及生态建设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保障。

坚持多角度多层次推进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要增强财政政策的基础保障功能，多管齐下，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实施，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一是助力提升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水平。农村基础设施作为农村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涵盖范围十分广泛。当前，我国城乡基础设施供给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长期以来，部分农村地区受地理位置和生产条件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加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资金量大、建设周期长、投资收益低，导致了基础设施供给水平不足。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公共性，把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作为主要着力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明确阶段性突破点，加大对重点短板项目的财政资金倾斜力度。另一方面，应进一步统筹涉农财政资金，更加注重绩效管理，在顶层设计上做到有重有轻、有急有缓，逐步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缩小城乡差距。此外，还要注重吸引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供给主体多元化，全面有效提升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水平。

二是助力形成产业振兴和人才振兴的良好局面。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基础，人才是关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从多个关键节点同时发力，其中发挥财政政策的协同作用至关重要。一方面，要体现财政政策因地制宜的灵活性，着力在培育乡村特色优势产业方面下功夫，为当地特色农业生产提供新思路、新技术，加快农业结构调整，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并通过产

业发展吸引和培养人才；另一方面，要延续脱贫攻坚期间的各项人才支持政策，为培养高质量的农业人才提供重要保障。要综合用好财政政策，通过加大对定向专业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助力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特岗计划、加大对农村各类优秀人才就业创业的支持力度等，建立健全引导各类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三是助力建设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美丽乡村。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实现农村环境的美化，建设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美丽乡村。这就需要在乡村振兴中强调绿色发展，财政资金更多向绿色项目倾斜。要统筹推进城乡生态、文化建设等，科学划定各自的管控边界，把文化保护传承和生态开发利用结合起来；要完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因地制宜、分层分类促进生态农村、文化名村建设；要推行多中心治理模式，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引入社会资金发展农村旅游业，把乡镇建设成为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实现县乡村功能的衔接互补。

此外，在乡村振兴中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还要注重与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健全财政风险补偿、风险分担机制，适当提高财政的补偿标准和分担比例，充分调动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积极性，还要深入推进农村金融服务体制改革，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支持成立政府出资的担保机构，撬动更多信贷资金支持农民发展生产、就业创业，更好服务乡村振兴。

总之，理论和实践充分证明，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要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做好基础性和兜底性工作，充分发挥引导性和协调性功能，花好每一分钱，提高财政治理效能，助力乡村振兴，从而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作者：马海涛，系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

开辟经济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王金照 陈斌开

《经济日报》（2022年7月28日10版）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湖北武汉考察时强调，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更大进展，不断提升我国发展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开辟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兴产业将成为一条事关各国竞争力以及发展潜力的重要新赛道。我们要抓住数字化和低碳化这两个战略方向，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作用，加快完善创新生态，赢得经济发展新领域新赛道的竞争，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产业竞争新赛道

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能源和信息等众多领域都孕育着重大技术和产业突破，一批具有全局性、长远性重大影响的产业竞争新赛道日益清晰明朗。

总的来看，新赛道发展大致会经历萌芽期、导入期和拓展期三个阶段。在萌芽期，新的知识和发现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其蕴含的颠覆性得到社会关注。在导入期，技术创新主要基于基础研究的积累和发展，不同类型的创新主体开始积极进行多元化的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探索。在拓展期，新技术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商业模式逐渐成熟，技术的应用将催生新产业，并加速向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扩散。当前，数字化、低碳化技术逐渐成熟，一批掌握前沿技术并创造了有效商业模式的企业开始从众多创业企业中涌现出来，产业组织开始由导入期的高度动态性转向更加稳定的市场结构。国家间产业竞争格局逐渐演变成“赢者通吃”的局面。率先推动主导技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兴产业扩散应用的国家，其技术能力、生产效率、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将大幅提升，成为新技术革命最大的受益者。

把握历史性机遇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也面临着内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的局面。从国内看，以往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条件和供需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经济增长模式亟须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必须找到新的增长点来支撑经济增长。从国际看，一些西方国家不断出台各种措施限制我国高科技企业发展，意图通过科技和产业“脱钩”阻滞我国现代化进程。综合来看，新赛道将是未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新赛道为中国经济从模仿走向创新创造条件。过去我国沿着发达国家的技術路径进行创新，尽管实现了追赶，但很难真正实现超越。新赛道是颠覆性创新的载体，也是中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的重要途径。从一定意义上说，新赛道与旧赛道之间的兴衰与更替是一个推动经济增长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会打破缺乏效率的旧产业、壁垒森严的技术垄断，有利于打破国外对我国的技术封锁。新赛道有利于定义新产品、培育新生态、拓展新领域，不仅可以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提高在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的位势，推动中国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攀升，而且能够培育新的增长点，带动经济增长。根据初步预测，到 2030 年，数字经济平均每年增长 9.9 个百分点左右，可拉动经济增长约 1.3 个百分点，低碳产业平均每年增长 8.6 个百分点左右，可拉动经济增长约 0.96 个百分点，仅数字化、低碳化两个领域就可拉动经济增长 2.3 个百分点左右。

还要看到，历史上每一轮科技革命都会创造出一些主导性的新兴产业，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决定国家兴衰成败。我国不仅要利用好以技术引进为主的“后发优势”，更要强调打造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核心优势，发挥好我国市场规模、产业基础和组织优势，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并借助历史机遇带来的“机会窗口”实现新赛道上的超车，在新的全球性科技和产业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找准战略性方向

当前，全球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的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都在朝着数字化和低碳化的方向进行改变。从一定意义上说，未来经济增长的主导性力量将由数字化和低碳化决定。制胜新赛道，应以数字化技术塑造新业态、新模式，以低碳化推动持续健康发展。目前，我国在低碳化和数字化领域的一些新赛道上已经占据先发优势，发展前景广阔。

要在数字化领域实现总体并跑、局部领跑。当前，数字技术正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环节，通过海量信息汇聚的数字平台为供需双方提供个性化服务，通过智能科技带动企业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我国 5G 发展在产业能力和网络建设等方面已居全球前列，未来要以 5G 大规模应用拓展为重要牵引，加快推进 5G 增强技术、标准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已经进入标准化建设阶段，正在逐步打造规范的产业体系，未来应继续突破重大基础理论，利用好场景和数据优势，力争成为全球主要的创新中心。还要看到，我国工业互联网

与主要发达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下一步要加快补齐在芯片设计制造、核心软件、算法上的短板，并发挥我国制造业场景丰富的优势，打造世界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同时，我国类脑计算技术已具备局部优势，预计类脑计算在未来 5 年至 10 年间将达到技术成熟期并实现大规模商用，需要做好大规模商业化的技术研发、市场培育和供应链准备；我国在量子计算多个领域取得国际先进成果，可考虑出台国家级战略规划持续支持量子计算发展，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力争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要加快巩固和扩大我国在低碳化领域的领先优势。我国新能源汽车已具备市场规模优势和全产业链优势，未来应充分释放国内消费潜力，抢抓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新机遇，提升全产业链创新能力，继续厚植产业发展综合优势，同时抓住机会扩大出口和对外投资，在竞争合作中形成新优势。我国动力电池产业整体上已稳居世界第一梯队，应持续提高产业基础能力，瞄准下一代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乘势而上，扩大优势。我国风电与光伏行业技术水平进入“无人区”，2021 年风电、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达 11% 左右，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供应链体系完备，行业未来发展应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优势，围绕促进创新发力，为新技术、新材料和新产品提供验证平台。我国氢能产业蓬勃发展，应多线谋划，加大技术研发、拓展应用场景，夯实科技和产业基础。

打造一流创新生态

我国拥有 14 亿多人口和 4 亿左右的中等收入群体，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全可以建立起以我为主的新赛道体系和生态。我国还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是全球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新赛道上具备独特竞争优势。立足国内发展现实，制胜新赛道，应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优势，并将政府的组织优势和市场的竞争机制有机结合起来，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聚焦产业政策、创新体系、金融支持、人才政策、企业发展机制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发力，打造一流创新生态。

第一，建设基础雄厚、开放协同的创新体系。合理布局创新体系，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三个环节同步发力，重视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建立开放协同的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保持政府持续稳定的投入。组织实施重大科技攻关，聚焦关键瓶颈，牵引科技能力提升。推动公共科研机构开放共享和组织创新，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加快提升知识和技术的源头供给能力。

第二，进一步提升市场主体创新积极性。增强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动力，可考虑将科技投入和产出作为创新型国企的重要考核内容；充分激发并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市场准入、研发支持、政府采购、人才培养等方面，要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做到一视同仁，助力市场主体发挥各自优势、高效协同，切实提升创新积极性。此外，还要壮大市场主体，优化产业组织，培育支持创新型中小企业聚焦细分领域，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夯实基础。

第三，建立健全培养和激励科技人才政策。一方面，要以包容和多元化的方式引进领军人才；

另一方面，要加快高等教育相关学科改革调整的步伐，加快高素质人才培养和创新型人才培养，同时畅通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间人才流动渠道。此外，还要加大对科技人才的激励，完善知识产权转化收益分配机制，通过推动国有科技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和明确相关知识产权归属等方式激励创新。

第四，完善高效协同的现代金融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既要加大资本市场支持，发挥科创板、创业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支持优质企业上市融资，加快科技创新企业成长速度，还要在战略性领域进行特殊的金融安排，可根据需要在新赛道领域成立相关基金，支持企业发展。同时，政府引导基金要把为完善产业链、为“卡脖子”技术攻关和商业化应用提供支持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

第五，加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和科技合作。一方面，要加强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主动参与国际竞争，抢抓全球向绿色低碳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市场机会，鼓励我国有优势、有长板领域的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要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开放我国的基础研究，吸引国际研究人员加入，加强与相关国家的科技双边合作。

此外，开辟经济发展新领域新赛道，要加强产业规划引导，政府应明确各产业部门责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统筹制定产业基础创新能力建设规划和实施路线图。同时，要加强内外部政策的协调，推动政府将资源更多投入到基础研究和早期市场培育上；加强整合中央和地方投入资源，鼓励地方在有优势和特色的方向发力；加强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益相关方的充分参与和科学论证，提升组织效率和投入产出效率，从而发挥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链的独特优势，构建面向未来的科技和产业政策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创新动力。

（作者：王金照 陈斌开：分别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减税降费的重大成效和重要意义

马海涛

《经济日报》（2022年11月17日10版）

税收工作是党和国家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税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并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税收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减税降费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税制改革中惠企利民的重要措施，可以有效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减税”指通过税收减免措施降低纳税人负担，主要涉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降费”指降低费用负担，涉及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缴费。近年来，我国减税降费取得重大成效。2013年至2021年，税务部门办理新增减税降费累计8.8万亿元，我国宏观税负从2012年的18.7%降至2021年的15.1%，特别是2019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当年宏观税负比2018年降低1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3.4万亿元，预计全年退税减税约2.64万亿元，政策红利将进一步释放。减税降费政策推动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进程，提升了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科学定位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财税体制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等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推进减税降费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基本依据，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服务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税收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激励企业开展各类创新活动”“对小微企业、科技型初创企业可以实施普惠性税收免除”。通过调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加强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支持。2017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在此指引下，我国逐步构建起以环保税为主体的绿色税收体系，运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进行转型升级和排污改造，护航绿色发展之路。

更大程度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公共财政活动的本质特征在于不断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减税降费一方面使市场主体更加活跃，另一方面有助于进一步改善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要落地生根，让企业轻装上阵”“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通过个人所得税改革，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并增加涉及基本民生支出的扣除项，使中低收入群体实际税负降低，收入差距缩小。通过扩大小微企业税收优惠范围，助力小微企业发展，进一步稳定就业。减税降费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

更大程度减少对市场主体行为的扭曲。减税降费以更大程度实现税收中性为原则，尽可能减少税收对市场机制的干预或扭曲，减少税收超额负担。一方面坚持非歧视性原则，避免不当的倾斜性扶持政策扭曲企业行为；另一方面轻税负，避免因税负过重强化纳税人的偷逃税动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减税力度”“推进增值税等实质性减税，而且要简明易行好操作，增强企业获得感”。留抵退税等政策一方面减少对企业资金的占用，增加企业可支配现金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助于更好发挥增值税的中性作用；另一方面畅通和完善了增值税链条抵扣机制，降低了企业财务风险，助力企业加大投资，积极进行技术改造，激发发展动力。

改革进程

实施大规模、实质性减税降费是税收政策顺应时代发展、经济转型作出的重要转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必然要求。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我国分步骤、分阶段推进改革，减税降费经历了结构性减税阶段，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阶段，普惠性、组合式减税降费阶段。

2008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叠加作用下，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结构性减税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正式提出，这标志着我国进入结构性减税阶段。在此阶段，我国开始出台一系列减少税收、降低税费的政策，首次实现“减税”与“降费”相结合。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营业税和增值税两税并行的税收制度已不能很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状况。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这标志着营改增工作正式开始。2012年至2017年，我国减税降费总体处于定向减税和普遍性降费阶段，减税聚焦增值税、所得税，重点针对特定行业、群体和区域。2013年至2017年，营改增试点改革已累计减税2.1万亿元，加上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清理各种收费等措施，共减轻市场主体负担3万多亿元。

2018年，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顺应高质量发展要求，我国进入普惠性、组合式减税降费

新阶段。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2019年全年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2%。2020年我国减税降费持续推进，推出7方面28项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2.6万亿元。2021年我国制度性、结构性、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组合发力，全年新增减税降费约1.1万亿元，新增涉税市场主体1326万户，同比增长15.9%，实现“培育税源、扩大税基”的良性循环。2022年我国落实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既有增值税留抵退税，又有支持科技创新、扶持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也有降费缓缴措施，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的特点。2022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5074亿元，其中，新增减税4097亿元，新增降费977亿元。

近年来，我国减税降费规模不断扩大、受惠主体不断增多，减税降费政策实现宏观降税负与微观降成本的统一，并与税制改革形成联动效应。分税种看，增值税方面，简并税率，推出留抵退税政策，征管效率不断提高。企业所得税方面，针对小型微利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并扩大所得税优惠政策适用范围，不断增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并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覆盖面支持企业研发创新，出台制造业缓缴税费相关规定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个人所得税方面，提高基本费用扣除标准，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扩大中低收入税率级距，由分类税制转变向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

基本特征

我国减税降费历程主要呈现以下三方面特征。

第一，减税聚焦增值税和所得税，总体税基减小。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作为我国三大主体税种，其政策变化时刻影响市场主体的生产、转型以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税基是计税依据之一，在税率未变情况下，扩大税基会增加税额，缩小税基会减少税额。通过减税，计税依据范围收窄，税额呈现总体减少态势。具体来看，在增值税方面，税基变化表现在起征点提高、进项税整体抵扣范围拓宽以及设置免税项目。在所得税方面，税基变化主要是应纳税所得额上限提高、免征额标准提高、设置免税以及扣除项目。

第二，简并税率档次，降低税率水平。税率结构的简化优化贯穿减税降费全流程。在增值税方面，税率改革以“快降高档、缓降中档、维持低档”为主要思路，将四档税率简并为三档税率，并以两档税率为目标。在个人所得税方面，以“降税率、扩级距”为主。一方面，不断缩小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的税率差距，兼顾效率与公平，对综合所得税率以及经营所得税率进行优化。另一方面，扩大级距，更加注重税负公平，主要包括拉长三档低税率级距、缩短中间税率级距，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税负。在企业所得税方面，优惠政策呈现出以产业倾斜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特征。利用税率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对于需要重点扶持的行业，实行免征、减半征收等优惠，并从法律层面加以明确，保证政策的规范性、有效性。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并可根据地方差异，动态调整不同地区具体优惠政策。

第三，减税与降费并重，确保普惠性。一方面逐步推进费改税，发挥税收杠杆作用引导市

市场主体行为。费改税是在清理整顿部分不合理政府收费的基础上，用税收筹集替代行政收费。税收具有内在稳定器的功能，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而收费旨在抵消政府成本，一般用于特定用途和特定服务。费改税包括取消收费和规范收税两步。首先是清理整顿收费项目，将行政收费费率降为零，取缔地方违规设立的收费基金项目，按照“清费立税”原则，规范税费关系，减轻企业不合理负担。其次是设计合理的税收规则。例如，资源税实施从价计征改革，以销售额作为计税依据，使资源税收入与产品价格挂钩，缓解资源产品高价格与资源税低税额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扩大降费受惠范围。为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我国连续取消、停征、免征多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呈现出降费政策数量多、力度大、覆盖范围广的特点。2011年至今，中央层面已经累计取消、停征、减免超过500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涉及农林牧渔业、制造业、金融业等国民经济重要行业。2013年以来，降费每年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超过1000亿元，减负效果明显。

实践意义

减税降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税收政策，是我国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政策手段，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政策支撑，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减税降费有助于在生产、交换环节“做大蛋糕”，有利于促进商品要素资源更加畅通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巩固和扩展市场资源优势、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一方面，减税降费能够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使企业有更多资金投入扩大再生产，有助于投资乘数效应的发挥，形成良性循环。尤其是针对数量大、分布广的中小微企业出台大力度的减免税和延缓征税举措，有助于缓解其资金短缺、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另一方面，减税降费通过改变商品相对价格影响部分领域成本利润，鼓励企业更加重视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创新驱动发展提高企业效益，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使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减税降费有助于在分配环节“分好蛋糕”，实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利用税收再分配功能，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减轻中低收入人群税负压力，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撬动消费增长。针对不同家庭具体情况，实施更加精准的政策措施，增加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及时有效回应群众关切。通过对政府收入做“减法”，换取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加法”和社会消费的“乘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铺就共同富裕之路。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减税降费政策有助于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的税权划分以及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调节的关系。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减税与退税并举，退税资金直达企业，有助于营造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减少税收对市场机制的干扰和扭曲。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继续保持增值税中央与地方税收划分“五五分享”比例不变，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拓展地方收入来源。通过税费调整实现社会

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短期性税费缓缴和长期性减税降费有机结合强化逆周期与跨周期宏观调控作用，熨平经济波动，保持市场预期基本稳定，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长期均衡。

（作者：马海涛，系中央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带来启发与机遇

福佩吉 张忠胜

《经济日报》（2022年12月22日10版）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各国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新概括。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从国际视野看，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各国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通过制定长期有效的规划和协调政策，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鼓励和支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有效激发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突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凡历程，特别是过去十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创新突破及经验总结，诠释了几十年来中国在探索、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以事实向世界证明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可以有不同路径。

反观西方现代化道路，其存在着根本缺陷。西方式现代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其发展受资本规律支配，表现为以剥削积累财富、以霸权掠夺资源，造成严重贫富分化、种族压迫、资源浪费、阶层固化、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战争等种种乱局。

具体来看，首先，西方的现代化模式造成且无法克服国内社会两极分化。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不平衡、两极分化状况一直是无法克服的基本社会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

西方现代化是资本主导的、少数人的现代化。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西方现代化在各个领域必然秉持资本立场，把资本当作社会主体和目的，把人当作资本增值的客体和手段。其次，西方的现代化模式高度依赖低端产业向外转移和先进技术对外封锁。西方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将生态环境代价高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后发国家，以通过资本优势和先进技术壁垒在世界范围内攫取超额利润，造成并进一步加剧全球各国间的不平衡。此外，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会不可避免地胁迫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利选择。西方的现代化需要国际资本集团在世界范围内追逐利润最大化，内在地要求利用西方主导的具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机构，通过金融压力、单方面制裁等手段，胁迫发展中国家走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接受各类不利条件，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深陷公共资产私有化、金融泡沫、巨额负债、污染加剧、贫富分化加剧等各种困境。

与西方的现代化根本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开放包容中形成的、能够有效解决人类社会发 展问题的宝贵成果。中国式现代化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超越了西方固有的单一线性、渐次发展的现代化模式，并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共享发展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基本国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 10 年，中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近 1 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2021 年，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78.2 岁；等等。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坚定不移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不以追求快速发展和获取最大利润为动力而牺牲环境，而是将发展生产力、提升人民生活质量、增进人民福祉和重视生态文明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中国正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式现代化不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或霸权主义道路，而是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世界发展的贡献也越来越大。

第一，中国持续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大动力。中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十年来，中国一直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 6.6%，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 30%。同时，中国一直在寻求国内和国际市场之间更好地互联互通，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目前已成为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第二，中国为世界减贫持续作出贡献。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减贫速度和规模均前所未有。据估计，过去 40 年来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近 8 亿，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 70% 以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借鉴中国的扶贫经验和方法，特别是借鉴中国过去几年推动实施的精准扶贫方略，以解决各自国家的贫困问题。

第三，中国绿色发展为全球生态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中国采取一系列切实行动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近 20 年来中国新增植被覆盖面积约占全球总量的 25%，居全球首位；中国还与许多国家就绿色发展开展广泛合作。

第四，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冷战思维，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持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分别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外籍专家、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如何从供需两侧发力扩大内需

戴宏伟

《经济日报》（2022年12月28日10版）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挑战很多，要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通过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支持以多种方式和渠道扩大内需。这为从供需两侧发力扩大内需、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和路径。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既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我国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又要注重需求侧管理，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全力扩大国内需求，夯实经济稳定运行的内需基础。

推动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求必须从供需两侧抓牢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其一，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体系与消费结构的适配度，有利于将居民无法得到满足而被抑制的新需求释放出来。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蓬勃兴起，以创新带动新供给，提高供给体系“技术含量”，将引领创造出巨大的新需求。其二，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需求端的释放和有效需求的实现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现途径。其三，从消费结构的变化来看，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物质文化消费，都存在着逐渐升级的规律，也正是消费的不断升级，刺激并拉动了供给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总体来看，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翼，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把握好需求侧与供给侧的辩证关系，注重需求侧与供给侧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发挥供需两侧对高质量发展的双轮驱动作用。要根据需求结构升级规律，以扩大有效需求为动力进一步拉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优化供给结构为抓手进一步刺激有效需求实现，从供给侧与需求侧两端发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以创新为根本，以质量为保证。市场上好的产品、新的产品背后是技术创新的支撑，只有在科技创新中掌握先机的企业，才能抢先推出新的产品并占领市场。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靠科技创新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瓶颈，完善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结构，保证供应链安全。另一方面，需求侧管理应以供给为基础，以增收为核心。供给最终需要转化为有效需求和消费需求。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撬动消费的重要杠杆之一就是价格。因此既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要努力降低物流、税收等各方面的成本，采取各种措施让居民想消费、

能消费、敢消费，真正让“需求牵引供给”。

从一定意义上说，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有机结合，需要把握两个关键词，一是“质优”，二是“价廉”。从目前我国供求形势来看，实现供求平衡的关键不是量，是质；不是总量，是结构。因此，供给侧发力的重点是调结构，包括调整优化城乡结构、产业结构等。其中，城乡结构的主要问题表现为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就需要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发挥中小城市尤其是县城的集聚、辐射作用，挖掘县乡消费潜力，带动农村消费这个重要市场。产业结构的主要问题是产业需要转型、结构亟待优化等，因此需要统筹推进补齐短板和锻造长板，针对产业薄弱环节，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并在产业优势领域精耕细作，搞出更多独门绝技。

需求侧发力的重点则包括：一是千方百计稳住就业，最大限度保市场主体促进就业；二是想方设法增加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三是降低物流成本，重点拓宽县乡以下的物流渠道，扩大农村需求；四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加强对医疗、养老等方面的财政支持力度，从多角度、多层面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把居民的消费活力真正释放出来，更好地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构建中国特色估值体系

陈运森

《经济日报》（2023 年 3 月 9 日 4 版）

探索建立中国特色估值体系，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资本市场的重要任务。证监会日前召开的 2023 年系统工作会议指出，逐步完善适应不同类型的估值定价逻辑和具有中国特色的估值体系，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构建中国特色估值体系，有助于促进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更好发挥，引导投资者的估值与投资判断。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的价值固然与投资者的选择息息相关，但更在于企业本身。IPO 全面注册制的推行，对于企业科技性、业务模式新颖性和自身成长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此，构建中国特色估值体系，有助于促使企业练好自身内功、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实体经济质量的持续优化。这一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应深刻把握我国自身的产业发展特征、体制机制特色和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因素，结合覆盖各行业大类、大中小公司共同发展的上市公司结构，同时考虑我国的经济体制、发展任务和发展路径，系统推动提升估值定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中国特色估值体系关注的重点是企业质量。企业要提高数字化经营能力，实现智能化生产和管理，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效率。同时，还应注重环保，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提高社会责任感和形象。此外，要不断加强企业的技术研发，实现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创新和自主可控，提高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对国有企业而言，更要通过改革来促进估值重塑。通过同业竞争资产整合及拆分上市等方式聚焦主业，实现国有资本更有效的资源配置以及价值重塑。

应培养投资者价值投资的能力。改进估值模型和策略，结合我国的产业、行业和企业特点综合定价，重塑估值体系。对于财务估值因素来说，要强化分红因子的权重。上市公司通过现金分红等方式向股东分配利润，是中小投资者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重要途径，也是吸引中长期投资力量入市的重要方式。提高分红因子的权重，有助于培育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理念。对于非财务估值因素来说，估值要突出企业的协调可持续等因素，促其发挥社会价值。还要重视政策对企业基本面的影响，以此综合定价企业价值并重塑估值模型。

监管机构也应密切关注估值风险。目前，A 股市场存在着多种短期估值溢价问题，包括概念溢价和壳溢价等。这些现象会损害投资者的长期利益，还会加剧市场的不稳定性，损害中国特

色估值体系的可预期性。监管机构要采取证监会行政监管、交易所一线监管、投服中心持股行权等组合措施，预防企业的违法违规行爲。监管机构应强化对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确保投资者估值所需信息的全面、真实和准确，以规范资本市场参与者行为，保障中国特色估值体系构建的基础。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何秀超

《经济日报》（2023年3月20日10-11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针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外开放工作，明确指出“必须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统筹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和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未来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所在，是持续发挥以开放促改革重要作用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体现。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此做了进一步阐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再次明确要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2022年“制度型开放”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2022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202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这些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科学指引。

随着全球价值链深度分工，国家间的经贸关系日益紧密，全球开放的政策措施逐渐由传统的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等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边境”措施，拓展延伸至以国内规制融合为主的“边境内”措施。制度型开放是一国从“边境开放”向“边境内开放”的拓展、延伸和深化，是各国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对接和协调，主要强调各国制度体系的融合性和兼容性。制度型开放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要加快构建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相协调的国内规则和制度体系；二是通过在国内实施一系列系统性制度创新，逐渐引领全球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制定，深度融入并重塑全球经贸规则。

制度型开放对于深化国内市场化改革、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提升中国在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下一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应在以下方面着力。

第一，积极参与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积极申请并签署更高标准的双边及多边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对标自由贸易协定中的高标准规则倒逼国内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进程。目前，中国已成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通过对标有关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等高标准规则，有助于加快制度型开放。此外，加快推进《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

第二，全力打造制度型开放新高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是中国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探索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载体和建设高地。应充分发挥好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制度改革和创新的“先行先试”作用，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实施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提升战略，形成更多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创新成果，为中国加入 CPTPP 等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和更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创造条件。

第三，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进国内制度改革的同时，还应探索新的制度创新，持续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以更加主动与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一方面，可通过深入实施 RCEP 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国际社会提供新的制度型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充分发掘中国在数字技术领域的优势，重点推动数字经济、数字货币、金融科技、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制度型开放，为数字经贸新规则制定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樊勇

《经济日报》（2023 年 4 月 4 日 10 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必须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新时代抓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目的是改变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使资源、生产、消费等要素相匹配相适应，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坚持不懈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就是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坚持系统谋划协同治理。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有序发展风电、水电、核电等非化石能源，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开发利用生物质能源，加快能源结构的调整优化；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快交通运输结构调整优化，形成绿色低碳运输方式；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水资源管理制度，推广节能和提升能效的工艺、技术、装备，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和循环化，强化建筑、交通节能，加强工业领域节能，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完善政策和标准体系。一方面，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体系。推进绿色税制改革，推行绿色产品政府采购制度；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依法依规在环境高风险领域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进一步完善居民用水、用电、用气阶梯价格制度；等等。另

一方面，完善绿色低碳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推进绿色产品认证与标识体系建设，完善产品能效、能耗和碳排放、污染物排放等标准，完善绿色设计和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制定节水强制性标准，调整完善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领域建设用地使用标准，健全“双碳”标准，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推动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完善工业绿色低碳标准体系。通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示范项目，推动研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健全绿色低碳技术体系。此外，还要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平台和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建立健全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推进水权市场化交易，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完善碳定价机制等，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

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地方各级政府要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切实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企业要严格执行节能环保标准，履行社会责任。要广泛开展宣传，将绿色生活理念普及推广到衣食住行游用等各方面，让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成为更多人的选择。同时，还要加强舆论监督，维护公众环境权益，推动形成绿色转型的良好社会氛围。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

夯实数字经济安全发展基石

欧阳日辉

《经济日报》（2023 年 4 月 4 日 05 版）

发展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不仅能推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数字社会建设，也有助于做强做优我国数字经济。应推动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打造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生态，为数字经济筑牢安全屏障。

随着数据跃升为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数据安全成为安全建设的重中之重，其内涵和保护对象不断延展。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共筑数字经济发展的“护城河”，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是数字产业化的重要业态。发展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不仅能推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数字社会建设，也有助于做强做优我国数字经济。

组建国家数据局将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加速数据安全产业发展，强化数据安全作为数字中国建设核心底座的地位。在顶层政策规划和旺盛市场需求的双重驱动之下，我国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正迎来发展黄金时期。

从需求方来看，我国的网络和数据安全市场需求仍将保持快速增长。随着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政府和企业对于网络安全建设的需求将不断增加。当前，我国政企客户网络安全建设预算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差距。比如，2023 年美国非国防联邦机构的网络安全预算占 IT 预算比例达 16.57%，而我国政企机构的网络安全投资占比仅 3% 左右。痛点就是商机所在。当前，政企客户的需求处在从买产品向买体系化服务的过渡期，这对安全产业提出了新要求、提供了新机遇。

从供给方来看，我国网络和数据安全产业处于蓄势待发的起跑阶段。目前，该产业形成了设备、软件和服务三大细分市场和参与者众多的竞争格局。未来，网络和数据安全产业布局有两大领域将充满商机：一是在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智慧城市、数字乡村、智慧医疗、智能家居、元宇宙等新赛道，安全领域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将迅速成长。二是在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安全防护边界不断扩大，“零信任”、云安全、检测与响应等热点技术和数字化转型的整体安全方案成为企业研发重点，数据安全、工业互联网安全、网络安全服务将成为重点发展方向，大型设备和软件厂商将快速崛起。

从政策方来看，国家高度重视网络和数据安全，出台了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

全等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颁布了促进网络和数据安全产业发展的政策。我国主要将在 4 个方面发力：一是国家对产业规模设定了预期性指标，地方政府提出了相应的规划。二是全面加强数据安全产业体系和能力，培育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骨干企业、单项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三是深度分析工业、电信、交通、金融、卫生健康、知识产权等领域数据安全需求，着力核心技术创新突破，攻关一批数据安全重点技术和重点产品。四是促进产业技术、产品、服务和应用标准化。

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需要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更多依靠市场化手段来解决。那么，如何推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高质量发展？当前，应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和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引导投资瞄准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的“卡脖子”技术攻关，重点针对金融、电力、能源、交通等重点领域不同场景联合开展技术攻关。

打造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产业生态。支持建立传统生产制造企业与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企业产融结合的发展机制，着力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壮大数据安全服务、推进标准体系建设和推广技术产品应用。企业要将内生安全理念融入网络安全体系建设之中，把安全能力内置到业务系统中。

为数字经济筑牢数据安全屏障。大幅提高国家信息化建设中网络安全投入比重，加快数据交易所、数据集成商、数据经纪商、数据合规认证商、数据资产评估商等第三方服务机构健康发展，推动数据安全产业领域的经营主体和应用场景快速发展，全面提升数据安全产业供给能力。